

No.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No.1 Amazon.com Bestseller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

美国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第1名

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常识

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

[美] 格伦·贝克 著

徐红燕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格伦·贝克 (GLENN BECK)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美国知名脱口秀“格伦·贝克计划” (THE GLENN BECK PROGRAM) 主持人及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名嘴。

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1776年，托马斯·潘恩的作品引发了一场革命。
今天，与你一道，一场新的思想革命就在此刻开始……

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THE CASE AGAINST AN OUT-OF-CONTROL
GOVERNMENT, INSPIRED BY THOMAS PAINE by GLENN BECK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by LAW PRESS-CHINA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by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BY
MERCURY RADIO ART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rcury Radio Arts/ Threshold Edition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7987

目 录

作者的话	1
序言	7
第一章 改造和重新定义美国	15
第二章 金钱：民众真正的鸦片	33
第三章 政治武器的选择：美国税法	55
第四章 政治阶层的优待和特权	69
第五章 进步主义的毒瘤	93
第六章 是朝阳还是落日？	147

作者的话

二百三十五年前,一名只受过基础教育的英国人前往英国殖民地开始新生活。这两年间,他努力工作,并注意到殖民地的同胞们开始厌倦英国的压迫。他决定采取行动。利用自己在出版业的关系,托马斯·潘恩以匿名的方式发布了一本小册子,该手册的论述逻辑性强、简单易懂且无可争辩,为革命提供了依据。

他将此手册命名为《常识》。

潘恩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文字,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776年1月《常识》发布,之后仅仅七个月,《独立宣言》就签署了。七个月——看似历史上

平常的七个月,却是在这段时间里,这片殖民地不可逆转地走向革命,直至胜利。

七个月改变了世界,永远地改变了。

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又回到了1776年,但这一次,我们前方的道路不是那么清晰。我们政府滥用职权的行为如同当年的当政者一样明显,但我们却不能像当年的人们一样站起来,发出一致反抗的声音,现在我们只是闲坐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千辛万苦换来的自由被一片漠然、世故和彻底腐败的泥浆慢慢吞噬了。

当我们每天在电视和广播中听到令人费解的辩论时,我们感到无助和孤独。其实这些辩论都是蒙蔽人的。我们的政党故意在我们内部引起内讧和分裂,目的就是阻止我们团结在一起。毕竟,普通人只顾就一些琐事而互相争吵,却忽略了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

当你在本书中读到关于两个政党对我们国家造成巨大危害的内容时,你会考虑该怎么做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我列出了几个选择,但我想明确地说明,这其中没有一个选择牵扯到暴力。托马斯·潘恩和他的革命

同志们以鲜血示以后人,使得后来人能够拥有比步枪和刺刀更强大的武器:民主武器。我们将利用这一武器开展第二次美国革命,这场革命将不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在3亿美国人民的心智中。

过去这么多年来,许多革命者以犀利的言辞,而不是锋利的匕首作为武器——这样的效果很显著。马丁·路德·金曾经对他的支持者说:“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成为极端分子,而是我们会成为哪一种极端分子……我们的国家和世界非常需要有革新思想的极端主义者。”

这种语言具有煽动性,但路德·金的意思是说为了事业抛头颅很容易,真正困难的是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创新性的方法。把暴力当作一条出路很容易——但暴力一定会给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抹黑。

马丁·路德·金在接受诺贝尔奖时表示,“非暴力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主要政治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他说道,“人们必须不使用压迫和暴力手段来战胜压迫和暴力。要解决所有的冲突,人民必须排斥复

仇、侵略和报复的手段。这样一种方法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历史已经证明路德·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思想的新革命就在此刻开始……与你一道。

托马斯·潘恩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证明了，做出改变不需要名望、地位和财富，只需要人们愿意说出该说的话。我不是托马斯·潘恩——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著名的激励家和一位英勇的爱国者——但我要说出下面一段话，只为安抚我自己的良心，而不为其他原因。

如果你认为，现在是该把原则凌驾于政党之上，人格凌驾于竞选承诺之上，常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候了，我请你阅读这本书，宣告你自己是一名有创造力的极端主义者，然后再把这些话语传述给其他人听，你可能赞同马丁·路德·金说过的下面这句话：

地狱中最热的地方是为那些在伟大的道德冲突中保持中立的人预留的。

不要保持中立。不要闲坐在一边。不要让别人替

你发言。沉默没有出路,我们需要再一次地用统一的声音表达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要求……

不要践踏我。

序 言

我想我知道你是谁。2001 年“9·11”事件之后,你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向好的方向改变了。但之后的几个月证明并非如此。我们内部开始分裂,“9·11”事件后,党派争吵一度在人们踊跃献血的队伍和教堂祈祷仪式中消失,但现在又复活了。

有时候你会和朋友就政治话题争吵,不是因为你是
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是你认为这些事情确实很重要。你
有强烈的信仰,且思想开明,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你想每天做正确的事。你努力工作,你总是很尽
力,而且你按照规矩办事。

你有信用卡,也有支付能力。你有一个家,而且你能偿付房贷。也许你买了一台不必需的平板电视机,但你从不贸然行事。

你并没有太多储蓄,你的退休金已大量缩水。

你也许会去教堂,但大多数周末,你并不想去——你宁愿睡上一觉,或者与孩子们一起玩耍。因为你很烦教堂礼拜结束后停车场塞车的状况。

你有孩子,而且和所有家庭一样,你有自己的问题——但你已经在解决了。你始终希望你的孩子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时间你做家长时的虚张声势。

你感觉每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家里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四处奔忙。你知道物质东西不重要,但你会困惑,当孩子没有某种品牌的鞋、没有最流行的电子游戏、没能报名参加五个不同的运动队时,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很失败。

现在孩子们所享有的东西,虽然你年幼的时候未曾接触过,但每当你回顾自己的童年时,内心却充满了怀旧和自豪的情绪。也许儿时你的家境很贫穷,你当时却

没感觉。

一整天劳累之后,你回到家中打开电视,看到评论家出现在屏幕一左一右两个框内,他们在对银行家的行为进行没完没了的分析,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那么不可思议。你担心我们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问题,你更担心会对自己的家庭有影响,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你试图关小电视的声音,并换台观看一个娱乐节目秀,但有时候你会觉得和孩子一起看这类节目感觉不自在。你不是一个清教徒,但你觉得一个三岁的孩子不应该观看这类轻浮的谈论性话题、嘲讽父母的节目。但你能怎样呢?其他节目更糟糕。

你教育孩子如何分辨是非,但你惊讶地发现,孩子从学校回来后,说话和行为习惯都和你平时教的不一样。你没有大惊小怪,毕竟学校里的才是“职业教师”,而且你并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你不是一个爱生是非的人,你只是想和每个人都能和谐相处。

你并不憎恨和你不一样的人,很久以前你就不再对一些敏感事宜发表意见了,因为你不想因为维护自己的

价值观和原则而被人视为种族主义者、偏执主义者和同性恋憎恶者。

你认为应公正和诚实地对待别人,但同时有着自己的是非标准。

几乎每天晚上你都是很疲惫地上床休息,你知道你第二天还得起床,然后一切再重复一遍。

你本以为你支持和拥护的政客们会关心你所关心的事情。但你开始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们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前途。你感到被利用和出卖了。

当你勤奋工作、节衣缩食、谨慎开支的时候,那些做法和你迥然不同的人却通过你的付出获得资助,你认为这是不对的。你现在意识到自私自利的政客和银行家们将国家的金融体制建立在一个纸屋子上,这间纸屋子已轰然倒塌,先前激动人心的许诺和瑰丽的预言也都不复存在。

现在问题的制造者——我们的政府,却在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做出牺牲了。你在想,他们难道不明白我一直在牺牲吗?你不是大手大脚花钱的人,也从来不花费你

没有的钱,你一直是按照常理做决定,但其他人却基于贪婪做出选择——现在却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同等地付出了?

尽管如此,你仍然愿意做出更多的牺牲,因为你希望美国成功。但你要求有一个建立在常识基础之上,并有机会被实施的计划。你曾经多次打电话给你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但他们根本不理睬。现在你只能对着电视吼叫,效果如同打电话一样不起作用。

昏暗的房间里,电视屏幕上的灯光映在墙面上闪烁。全国各地的人在茶话会上穿梭的镜头充斥着荧屏。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觉,你想做些什么,但那不是你,你不是一名活动家。你不会制作标语牌大喊着:“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所以你只好关上电视去睡觉了。

每天晚上你似乎都在面临着一个选择:你是关上电视还是要大声说出来?这两个选择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所以你什么也没做……你的挫折感不断滋生。

走出安逸生活的第一步

被贴上“危险分子、武装分子或者疯子”标签的最快方法就是引述我们的建国元勋们说过的话。我认为这是因为话语产生影响,而建国元勋们发表的讲话和他们的想法都是具有革命性的话语。

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政治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即使我们的政治看法有分歧,“我是一个美国人”这句话不仅是一个文字组合,还承载了一种思想,这句话之所以很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人民”赋予了其力量。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把这一点忘了,所以当我们的国家偏离航线时,我们感到的是渺小和无助。

也许我们需要被人提醒,提醒我们是谁,谁是真正的掌控者,而且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为何到了今天的

境地,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不像我们儿时的美国。让我们开始做一些我们被教育从不应该做的事情吧:让我们宣布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的理由。

第一章

改造和重新定义美国

我们投票不是要改变共和国,我们投票是为了改变华盛顿的政府。我们需要结束谎言、结束腐败和孩子气地指责“是别人引起的”的游戏。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政治精英们认为我们想要的“改变”只是过渡到一个以政府授权和施舍为基础的体制。这种想法无异于伤口撒盐,证明我们两个政党已经和人们所期待的完全脱节了。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改变的要求可能让他们感觉很突然。事实并非如此。由两个政党造成的这个局面已经存在很久了,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哪一个党最先夺走本属于我们的权利。

大部分美国人仍认为美国在错误的轨道上。他们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却不知道如何形容,或者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去制止。你也许不知道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感觉是错误的,你的想法没错,情况是有点不对头,而且已经很久了。

两个多世纪前在费城发表的宪章为我们确立了一条正确路线,但美国却一直缓缓地偏离这条路线。通过诸如战争、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这些看似合理的“紧急状况”,并利用我们的恐惧心理和对安全 and 经济稳定的渴望,两党政客进行非法集权,代价是使我们失去了自由。而现在,经历所谓大规模的改革后,我们不仅仍然在错误的轨道上,而且感觉这列偏离轨道的火车速度加快了。

在今日的美国,常识已完全消失了吗?学术诚实有月光条款吗?我们国家不缺资本和债券;我们缺乏的是诚实和信任。那些不讨论总统或政党,而辩论是与非的美国人哪里去了?那些敢站起来说“我家还有常识,是华盛顿政府该重新应用常识了”的人,现在在哪儿?

已有窃国者潜入美国,你内心的困扰就是最后的警告,警告我们国家将要遭偷窃。美国的建国先驱们理解权利和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礼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有直觉的人民。如果一切都是真的,上帝将会警醒我们即将发生的损失,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现在上帝的确这么提醒了——我们很惭愧,把他遗忘了那么久。

通过鲜血和牺牲我们获得了自治和自由的珍贵礼物。但因为我们轻易得到了这个礼物,所以我们很不珍惜。昔日的爱国人士为了“免费政府住房”,为了公司和个人福利的安全保障而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忘记了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

在宪法签署后,街上的一名妇女问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您给了我们什么?”富兰克林回答说,“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坚守住它的话。”

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的共和国处在毁灭的边缘。我们能坚守住它吗?

如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担心是“不能”,

那我们除了自己就不能怪罪谁了。那些被我们选举出来保护捍卫宪法的人,尽管道德上有瑕疵,长期以来却被我们忽略了,我们依然接纳他们、拥抱他们。我们降低对他们要求的同时,就降低了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想过安逸的生活,一种风险小却有高回报的生活。为了有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断地赋予窃贼和骗子以权力,仅仅因为他们许诺给我们舒适的生活。现在,因为我们的惯养,他们一次次地伤害而不承担后果,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当我们大声抗议时,他们以当选后利益共享犒劳我们,以稳定的津贴和财政糖果安抚我们,然后我们又安心睡觉去了。

我们不再相信我们选举出来的那些人的品德,我们大部分人甚至不愿邀请他们到家中共进晚餐,更不用说把我们的孩子留给他们照看。但现在我们却把自己的国家和自己孩子未来的经济生活交给他们管理,为什么会这样呢?

常识告诉我们,这是国家在自取灭亡。

睁开你的眼睛吧!这些人把我们剥夺得一无所有,

却以教育下一代的名义,对孩子灌输教条施以误导,使孩子们背弃我们所珍视的原则和价值观!

他们放火烧我们的房屋,封锁出口,却叫我们不用害怕,说他们就是消防队。什么时候才有人把真相大声吼出来?他们不是拯救者,而是纵火犯;他们不是在挽救我们的国家,而是在毁灭它!

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免遭政治和经济上的奴役,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认识到的:美国出现了超出这次经济危机的严重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并承认,我们自己负有关键责任,从而导致这些问题的产生。最后,我们必须选择维护我们的建国原则,使我们大家摆脱那些已被证实违法的人的毒害——没人能逃脱法律制裁。

1776年,《常识》这本书唤醒美国人正视眼前的现实:一个压迫的英国政府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通过简单的问题,潘恩鼓励同胞们正视美国的问题,以崭新的眼光看待未来,以简单的逻辑做一剂健康良药。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和自然法则再次脱节。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现在已经颠倒过来,变成一个由政府

治理、政府拥有和政府享有的政府,让人民见鬼去吧。

很显然,华盛顿所谓的政治专家、华尔街的企业专家,以及教育界和社会上自封的专家们在政府意义上犯错已有很长时间了。他们凭借的是常青藤名校的高等教育、家庭关系和错位的自我感觉,他们不会去倾听出租车司机、做母亲的和水暖工们想说的话。他们付给我们小费,却让自己的口袋里盛满了我们的钱——他们得意于自己的看法,认为美国的普通大众太笨,可以忽略。

托马斯·潘恩这样写道:“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些文字在今天如当年一样真实。作为全世界自由的模范,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特殊的地方。你现在还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不相信——为什么?如果相信,那你是否真的认为,摆脱专政获取自由——这种属于“全人类的事业”现在还能保证吗?

历史需要一个明确回答。一种选择是将我们引向超国际主义,美国将不再拥有主权,另一种选择将使我们恢复自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回答这个

问题,承担后果,否则我们的轻率和漠然将代替我们做出回答。

这个问题不该留给华盛顿的那些政客们。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相信什么,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华盛顿的“解决方案”是否正确。我们大喊着“不要只是站在那儿——做些什么!”如果这样我们会为结果而懊恼的。相反的,常识会使我们这样质问,“等一下,如果这么快做出决定,会不会是在冒险,而破坏更高层次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回答是振聋发聩的“是”。无为常常是最好的行动。

为了政治上权宜之计而“采取行动”,会危害到自由事业、资本主义、创新和自然选择的进步法则。我们要做些事情,但要是正确的事。

这就是关键所在,不是吗? 电视节目中没人能够提供“好的方案”,你不可能无条件接受他们的建议,对待我的建议也一样。所以,你必须让自己有权利,有自己的看法,重新找回我们共有的原则和价值观。

如果你和我一样,人生也经历过很多次失败,那么

之前的一切失败就为今天拉开了序幕。那些失败的经历给了我们智慧、谦卑,还有许多人想要逃避的一种深切感受:挫折感。但经历过失败的我们知道,这是成功道路上必须迈出的一步:这一步却被政府以安全保障和资金救市方案绕过了。

专家和精英们没有意识到走捷径也要自食其果。在一个深植于民主的国家里杜绝失败将使这个国家背离逻辑。经济规律和自然法则似乎不再适用了,如果不喜欢失败的结果,只要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就可以了。

不幸的是,这些都被我们赶上了。常识法则不随范围大小而改变。如果这对你家的账本行不通,那么它在国家预算里同样行不通;如果在你自己家里不起作用,那么在白宫也不会发挥作用。

让我们把常识运用到“背债不是件坏事”的谎言上。背一点债没太大关系,这种说法有点道理,你可以为一套合理的房子借上一笔合理贷款,但大部分人忽视的是,只有在一个负责任的金融环境中,债务才能正常周转。

他们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们将来会还清债务”。如果你健康、年轻，刚刚踏入职场，这种说法倒说得过去。但美国已经不再健康、国民人口趋于老龄化，有的公司在赋税重压下奄奄一息、有的则被华盛顿的政客们接管——而这些人除了律师事务所之外从未经营过企业或做过其他工作。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大部分人勤奋工作，按规矩办事，只希望分配公平——但我们累了。我们厌倦了愤怒、厌倦了受骗，或者坦率地说，我们厌倦了疲惫。但我们是这个时代自由的守护者，别人已让我们失望，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面对残酷的事实，做正确的事情，而不去计较个人得失。为了获得上帝赋予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已经有二十代富有牺牲精神的美国人为之奋斗。

但是我们还有能力修复我们的共和国吗？还有足够的公民愿意为自由付出艰苦劳动吗？我们是否成了一个宁愿被照顾、被喂养、受别人施舍衣物和住房的民族？我们被告知，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一个家长制的国家？不幸的是，事实暗示我们选择了后者。

我们的领导人为印制更多钞票而出卖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已经够糟糕了;但很快我们也放弃职守,走上同样的道路,日常生活中,我们从金本位标准转为借贷标准。美国人变了。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贷款是为了买一幢房子或一辆车,或者供人读大学,而我们却依赖于贷款生活,并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我们已经挣到手的。我们听从那些雄心勃勃的政客们的虚假承诺,认为我们此刻都值得享受最好的东西而不用计较成本。突然之间,我们的暑期度假、平板电视、游船、衣服和华丽餐厅里的晚餐都以贷款的方式被提前“消费”了。

与此同时,那些政客、跨国公司和货币兑换商们已经重新定义了美国梦。从小到大,很多人没想过自己被看作是“穷人”,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人能够接受不富裕的念头。政客和媒体告诉我们美国人将拥有最丰富的物质、最漂亮的汽车和最大的房子。似乎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还告诉我们,同情心是资本主义所没有的。

我们现在能看出这些都是谎言。同情心和资本主义紧密联系,但同情心却和这些人真正推行的贪婪不是

一回事。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上他们的当——有些银行和借贷公司拒绝玩“赠送房屋”的游戏。他们在评估借贷人时,个人贷款、收入和品德仍然很重要,他们小心谨慎,拒绝给不合格的借贷人提供贷款。而结果是他们被贴上种族主义、贪婪和脱离新形势的标签。

简而言之,政客们向我们承诺通过一条简易的道路获得成功和幸福,我们很多人支持并热烈追捧。我们怎么被骗了呢?父母和祖父母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何就被我们遗忘了呢?事实上,实现拥有美国梦没有捷径可寻,需要艰苦工作和对核心原则和价值观的不懈追求,而最重要的就是耐心。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轻松获取;没有什么很快到手。

但现在这种想法已不那么普遍了。

曾经向我们许诺美好生活有捷径可寻的政客们,现在又开始抛出另一个虚假承诺了。每天,他们在电视上、广播中不断地向我们宣讲,如果我们花很多钱,解决他们制造出的问题,他们保证可以结束我们债务的恶性循环,不再有任何痛苦。人民相信他们,认为仍然可以

通过捷径走出困境, 我们被误导了, 还认为我们本应拥有的生活依然触手可及。

尽管政客们一直想打破自然法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谎言终于架不住市场和自然法则的考验而被戳穿。政客们依然认为人们不需要艰难地做出选择, 伴随着美国人成长的艰辛困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需要了(当然, 除非你是富豪)。当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不是所有人承受艰难困苦时, 政客们则放大了嗓门喊“1% 最富有的人”、“乔治·W·布什”、“承担你的一份”。

煽动阶级斗争不是解决方法, 这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但现在没有人能转移我们的视线, 因为已经证明政府在守护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方面, 是一个不能依赖和信任的伙伴。

如果你认识到共和国面临的威胁, 那么唤醒周围的邻居是你的责任, 请他们考虑如下几个简单的问题:

- 你相信那些当权者总会告诉你真相吗? ——尤其大选时可能损害他们利益的时候。
- 继吉米·卡特之后的历任总统都承诺减少我

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但现在,我们从对我们有害的国家进口石油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怎么会这样呢?

- 我们能相信吗,一个在 8 年之内将人类登月梦想变成现实的国家,一个在 7 年之内建成跨大陆铁路的国家(没有动力工具或者机器),居然没有能力实现 2005 年曾许下的承诺——在我们南部的边界建起一道 670 英里长的围墙?

- 政客们坚持认为美国是一个“熔炉”,却又首先表态不同种族、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保留他们独特的语言、身份和行为习惯,这是什么原因呢?

- 为什么那些对全球变暖问题礼貌提出质疑的人受到嘲笑和谴责?

- 你相信你选举的代表们真把自己看作“人民公仆”吗,能够把你的福利看得比他们自己的还重要吗?

- 华盛顿的政客们做决定的时候是看你的脸色,还是只看那些大选时慷慨给予资助的人的眼色?

- 你相信我们的“人民公仆”会始终牢记你的最高利益、捍卫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吗?

你知道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你相信美国的承诺和未来。你必须响应先辈们的号召,投身于拯救美国的事业。这将不是一次简单或受欢迎的旅程,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简单”旅程的诱惑是错误的,因为它经常意味着不得不通过一条更危险的道路回家。

如果再出现一次华盛顿认为它“不能错过”的“紧急状况”时,会有各方声音呼喊不同的方向。许多方向将是误导——一些是明知故犯。不要急于选定其中任何一个方向,其他人恐慌时,要保持镇静。有些政客利用人们的恐慌和困惑,在紧急状态下草率立法,扩张政府权力,即便这种权力他们自己都不大理解,如果听从这些政客的意见,将不符合公民的最佳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恐慌不会将船引领到安全的港口,只会引向更远处的大海、更深更危险的水域。

你不能以捍卫自由的名义掠走自由,不能以拯救市场的名义去摧毁自由竞争的市场,不能通过禁止不同政见者发表意见来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保护的名义夺走人民权利或以消费的方式摆脱债务的做法都违背了常识。

我真诚地相信,拒绝讨论和辩论不属于美国文化。我同意建国先辈们所说的只有在百家争鸣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思想才能被认可,最终占上风。只有那些害怕真理的人才会禁止辩论,威胁不同意见的人,或诋毁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那些知道自己正确的人没有理由阻挠辩论,因为他们自己意识到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将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例如,主张通过增税和增加消费来对付气候变化的人似乎并不理解这一点。如果科学真的在他们一边,他们又何必在乎反对者的意见?“辩论已经结束了”这句话只被那些知道自己从没赢得辩论的人挂在嘴边。

其实不是辩论本身,而是那些阻止辩论的人才是真正非美国式作风的。诚恳地聆听,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询问才是美国实验主义的根基。我们必须对彼此的话洗耳恭听,并真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要意识到愤怒和真相之间的差别。

不幸的是,华盛顿的很多人都知道实实在在的辩论将露出他们的尾巴。他们许诺要公开透明,但却提出1万多页未被阅读或完全理解的法案要求批准。他们许

诺开放,但却在幕后加快实施他们的计划。

2008年3月,乔治·W·布什总统告诉我们,贝尔斯登是一家大银行,不能让其倒闭。如果我们大家本周末之前不采取行动拯救它,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行动了。自那时候开始,所谓“不能倒闭的大银行”的清单列出了长长的一串,达到500家以上。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资助银行的金额达到12万亿美元。

更糟糕的是,掌管纳税人钱的人早已证明了他们的无能。

也许你忘记了国会议员曾经在他们自己的私人银行——国会银行签发了8331多张的空头支票,迫使银行因他们的无能和贪婪而倒闭。现在,这些连自己的银行都经营不善的政客们却被授权掌管这个国家的500多家银行,包括几家最大的银行,你难道不觉得这是很傲慢的举动吗?

你是否忘记了,我们的领袖曾对视着我们说要解决国会银行的问题,却很快又签发了4325张空头支票?

你是否忘记了,这些透支支票并没有被征收费用,

如果换成我们的话,这笔费用可是在所难免的。

有没有人认真地提出疑问,如果不是国会议员,而是私营银行签了 12,000 张空头支票的话,会不会有无休止的电视听证会、镜头前警方逮捕嫌疑人及罪犯被判刑入狱的画面?不奇怪吗?失职的“人民公仆”没有坐牢,而做替罪羊的国会警卫官却被判 2 年监牢?

当然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政客和你我都不一样。他们就像外星人,认为自己智商更高,无须按照我们的规则办事,也没有廉耻心。

那些连自己的银行都经营不善的政客们现在定期做客于电视节目中,告诉大家他们能解决经济危机。他们的谎言越来越多,而且出言不假思索。

政客们要将目前的辩论定义为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管教失去约束的银行家。这其实不是关于金钱的辩论,而是关于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的生死斗争。国家经济这艘轮船正带我们驶向一个完全改变的美国。醒来吧!两个政党和许多个总统已锻造好经济奴役的锁链,他们将要把锁链套在我们的孩子以及后代的脖子上。

我们不能让政客们继续着无理智的行为,也不能允许我们集体疯狂的不作为。我们必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和平但有目标的行动。国家的情况太严峻,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盼望着那些一直违背我们建国原则的人能多少意识到他们做事方法的错误,那么风险就太大了。如果你认为你支持的政党当权,或者你支持的人获胜,情况会有所不同,那么请你重新思考。两党都背叛了我们的建国原则,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和共和国的原则一致。

我深信,在日益强大的独裁面前我们之所以集体沉默,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斗争的重要性或者面对的威胁。也不是因为懒惰或者缺乏爱国激情,我们沉默是因为我们没能越过党派偏见看清楚问题的实质和答案。

不要再这样下去! 常识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来自不同党派的每个人,让我们用常识去迎接挑战,揭露背叛,发现真相。

第二章

金钱：民众真正的鸦片

曾几何时，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激励我们以勇气和决心面对令人畏惧的挑战。他们领导我们取得了与英国人斗争的胜利。他们说服我们摧毁了纳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这些思想滋生的老巢。他们激励我们开展了长达 55 年的遏制前苏联扩张的斗争，当我们看着前苏联在其重负下坍塌时，全世界都为之瞩目。

曾几何时，当面对多疑挑剔的选民时，我们的政治领袖通过领导力、气质、经验、判断力、品格和美德而赢得大众的信任和支持。而今天，他们吹嘘着能为选民争取地方经费，或者他们用几十亿美元资助了强大的政治盟友，以此来收买人心和筹集竞选活动的资金。

除几个知名人士例外，政治领袖们已变成吸食我们血汗的“寄生虫”。他们不重视美国的潜力或者意识到她的高贵，相反，他们要榨干这个国家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丝毫不考虑她的健康。

这些寄生虫们已经隐藏了很多年。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政治精英们大肆挥霍我们财富的行为暴露无遗，他们没有为我们做好应对经济萧条的准备。经济繁荣时，很难看清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但现在，他们吞噬国家资产、掠夺我们薪资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不幸的是，我们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些人所做的是临界叛国。他们可能并没有直接把国家机密泄露给我们的敌人，但他们成功地将暗箭瞄准我们的后背。对于我们的经济危机，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欢欣鼓舞，并阴谋策划如何激发我们最终的毁灭。

我曾经在不同时候说过，法西斯主义在我们现在两届政府里处于抬升势头。不管你叫它什么主义，常识都不允许说这与我们先辈们建立的制度有相似之处了。

在布什政府时期,政治和跨国公司支配了我们的经济和边境政策。我们和建国原则背离得越来越远,这其中,国家构建和国际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其任职后期,布什还攻击美国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放弃自由市场原则是为了挽救自由市场体制”。

这一切已经够了。

我们必须停止华盛顿“消费”的这种病态。我们必须现在立即停止!这些上了瘾的人已经累积了11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摊下来,你的家庭因此支付的债务在11.6万美元。不要期望政客们的同情和理解。他们只是需要更多的钱。再给一次资助他们就停止,真的,他们确是这样许诺的。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给予的是空头承诺——12 万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公司福利和其他资助都还不够。

政客们已经忘记,联邦国库里的钱是神圣的资金,是通过上百万美国人的劳动、鲜血和辛勤工作换来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每天晚睡早起,错过了本应和家人在一起度过的无数个周末和夜晚的美好时光,只是为了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领导者使我们陷入目前的处境,而不对一个开支巨大的项目说不。通过行动他们教导美国人,花自己没有的钱不仅合理,而且是爱国的。政府在“9·11”事件后没给一分钱资助,总统反而呼吁大家去“消费”。

常识告诉我们,你 cannot 通过背负更多的债而摆脱债务,或者花更多的钱来解决自己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可惜常识本身不能销售,否则那将是我支持的唯一一份国家采购订单。

债务:他们如何换取了我们的沉默和屈从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尽可能地避免背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生活,按规矩做事,希望有机会使我们的孩子享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

托马斯·杰弗逊知道国债不仅是不好的经济政策,而且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因为将来你的孩子要为你买的东西买单。杰弗逊说,“以资助的名义花钱然后让后代

偿还,这很大意义上就是对下一代的欺骗。”如果还不清楚,杰弗逊说,政客们应该考虑“自己没被授权让我们的后代背负我们的债务,道义上应该我们自己负责偿还……”

政客们对这种建议置若罔闻,他们糟蹋了我们的梦想。实际上他们已把我们的孩子打上奴隶烙印,将来受我们债主的奴役;把我们的国家置于受其他国家支配的地位。如果我们想通过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逃避掉那些义务,我们就要承担责任。

当我们使自己深陷债务时,我们只能埋怨自己——这对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是我们推选的人把我们逼到受经济奴役的地位,我们选举他们使他们掌权,然后在一届届的选举中继续给他们投票,即便当他们的极其无能已彰显无遗的时候,我们还在给他们投票。难道不是这样吗?是的,是我们的政客商议并批准了不必要的政府开支,但不正是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吗?

支付 11 万亿美元的债务意味着要支付的利息达到

每月 260 亿美元。还给债主的钱(可能是国外债主)将超过每年 3000 亿美元,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改造我们的学校、道路或者加强国防。常识告诉我们这样不能长久——一个没有能力教育和保护自己人民的国家是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领导人经常玩弄我们的一个把戏就是对数字的错觉。如果我要求你寄给我一张 4000 美元的支票,你可能会想这笔钱能做些什么(心动的假期、新家具、孩子的牙箍等),然后你会奇怪为什么你要把钱给我呢。但当我们政府要我们每月支付 260 亿美元时,我们却没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感觉好像和自己无关。

好,让我们把它具体化。一个月 260 亿美元的利息相当于我们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年度预算 61 亿美元)、海岸巡逻队(87 亿美元)和内务部(111 亿美元)一年的预算总和。

一年 3000 亿美元的利息相当于把我们国家商务部(81 亿美元)、教育部(680 亿美元)、国土安全部(423

亿美元)、房屋和城市发展部(523 亿美元)、能源部(232 亿美元)、司法部(250 亿美元)和劳工部(496 亿美元)一年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和。

到 2019 年,国家债务的年利息支付额将升至 8060 亿美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信用卡的利息攒得很快。数目再小也会产生未支付利息,给我们本已沉重的债务添加新的负担。这是一个似乎无法退出的循环,对我们国家的危害似乎无法避免。8060 亿美元甚至超出了我们去年一年国防部(5830 亿美元)、退役老兵事务部(866 亿美元)、交通部(687 亿美元)和国务院(189 亿美元)全部支出的总和。

这些钱从哪里来?谁来支付?政客们又会说“富人们!”或“贪婪的公司!”——如果我们这样计划,那么我们注定要失败。埃克森石油公司(452 亿美元)、通用电气(174.1 亿美元)、沃尔玛(127 亿美元)和 IBM(123 亿美元)在 2008 年盈利的总和为 876.1 亿美元。即使我们对其利润征收 100% 的税,我们仍然达不到要偿还的年度利息的三分之一——更不用说本金了。

那么对富人呢？如果我们在未来 10 年内对每人征收个人所得税，也无法凑足钱偿还国债，即使不计利息的话。而且在未来几年我们做政府年度预算的钱也没有了。

这就是现代奴隶制，与过去被卖到农田里干活不同，我们的孩子们一周将工作一百小时，偿还我们堆积起来的债务。

如果这是发生在你的家里，常识就会被大声喊出来，你必须立即停止花费。那么华盛顿政府在做什么呢？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比以前花费得更多。

奥巴马总统宣布，政府 2009 年的预算将产生 1.7 万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你把这个数字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在一年中每天的花费是 46.57 亿美元，每一秒花费 53,906.64 美元。就在你把这一段读完的时候，我们政府花掉超出大部分美国人 20 多年的工作所创造的价值总和！

借债还钱——但最后却不是我们来还。孩子们将会质疑我们的理性，质疑我们为什么花没有的钱，把

钱花在“没有出路的桥”、滑板公园、去除纹身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分肥项目,这种项目被塞进“必须通过”的法案中。孩子们会困惑,为什么我们会容忍我们推选的领导人做出这种鲁莽的行为,而不是要求他们承担责任。

我们该如何回答呢?

那么现在你愿意付多少?

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

一个成功的庞氏骗局就是把新加入投资者的钱付给前期投资者。只要骗子们继续诱骗新投资者注册,那么这个循环就不会终止。

我们知道,伯尼·麦道夫上演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骗走投资者 500 亿美元的资金——但这与华盛顿政府庞氏骗局窃取金额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社保就是“合法庞氏骗局”的一个最佳案例。每次你工作挣了些钱,政府会把你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投

资”到社保基金中去，政府坐在一旁收取利息，一直到
你退休开始领取你的社保支票。

至少，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情形。但真相是
你的钱其实没有放在那儿等着你退休，而是政府把它花
了，留一张欠条放在社保基金里。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所做的和伯尼·麦道夫所做的
没有区别。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骗我们说很安全，然
后把钱花了，中饱私囊。但结果却不一样，麦道夫关了
牢狱，而我们的政客却去赶赴他们下一个鸡尾酒会。

他们认为他们不受法律制裁——现在我们应该向
他们表态，他们的想法错了。

我们的社保基金里如今充斥着无数张一文不值的
欠条，存在一个巨大的约合 13.6 万亿美元的债务缺口，
让人吃惊，真的很吃惊。也就是说，政客们向将来退休
的人们所许诺支付的 13.6 万亿美元资金根本不存在。

这是初级诈骗，之所以叫做庞氏骗局的原因是现在
到了崩溃点，美国在“二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人有几
百万，他们现已到退休年龄（开始领取退休金）。这意

意味着刚刚缴纳的社保基金将被用于支付这些老年人的津贴。实际上,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金字塔倒过来。(不用把工资所得税翻倍或翻三番——因为征收用来还债的收入税已经很高了,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行的。)领退休金的人要少一些,缴纳社保的人应多些。

美国人骨子里意识到了这个骗局,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更愿意两倍相信于 UFO,而不愿相信他们将来有一天会领取到一张社保基金支票的原因之一。要知道这是 1994 年做的民意调查,那时的预测还不如今天这么准确!

等一等,还有更多!

我们的 100 万亿美元的两党阴谋

就像大多数失去控制的政府方案一样,医疗保险的初衷非常好:帮助老年人和退休公民支付医疗费用。

医疗保险有几个不同的部分,但其中有三部分将导致我们经济的衰退:医疗保险 A 部分,用以支付住院和门诊费用;B 部分,用以支付医生探访;D 部分,用以支

付处方药费用。不幸的是,和社保基金一样,医保只是更大的一个庞氏骗局,那些被许诺支付的医疗费的人数太多,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支付能力。

医保 A、B 两部分积累的无资金支持的债务高达 68 万亿美元。尽管知道医保已处于赤字,政客们还是在 2003 年批准了《医保处方药,改善和现代化法案》,该法案授权医保支付自 2006 年产生的处方药费用。在不到 3 年的时间内,该法案(医保 D 部分)已额外积累了 17.2 万亿美元的无基金支持的债务。

美国前审计长大卫·沃克(负责保管政府的“账本”)把医保 D 部分称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最不负责任的法案……因为我们承诺的远远超过我们有能力支付的”。

我认为,沃克先生的评语太宽容了。这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财政法案,而是一个近乎犯罪的失职罪。政府花掉本不属于它的钱,这和大街上一个人花掉信用卡里的钱,而丝毫没有偿还本意的行为没有区别。这两种行为说好听些是道德上有问题,说不好听些是犯盗窃

罪。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窃取了我们的自由、繁荣和主权。

如果有人对数据跟踪的话会发现,只为了履行无基金支撑的社保和医保支付义务,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让我们的后代背上 99.2 万亿美元的债务。

对于你和你的家人这就意味着,不论你消费时多么有责任心,或者你生活得多么节俭,国家 100 万亿美元的债务分摊下来,每个人就是 33 万美元,即一个四口之家将背上 130 万美元的债务(但还是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债务除外)。好消息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毕业生一辈子赚 153 万美元,意味着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你的家庭状况,养更多的孩子。请记住,把庞氏骗局的金字塔颠倒过来是唯一的方法——尽管常识告诉你这种想法只是延迟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因为孩子们有一天也会退休。气候问题专家们也会惩罚这种念头,因为增加人口的做法就是“不负责任的”。

很显然,民主党和共和党(医保 D 部分的拥护者)都不太关心。他们知道到了将来该买单的时候,他们或

者靠着政府津贴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联邦医保方案,享受着周到的医护,否则他们就死路一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动力做正确的事情,他们只是受政治的驱动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认真的考虑、对每个政客任职期限进行严格限制。不,把公务员也包括在内,包括官僚们、管理者、法官和被任命的官员们。政府公务员任职不再是终身制。也许缩短他们的工作期限,会让他们从长远考虑得更多。

社保和医保两大问题一直被称为美国政治的“烫手山芋”——接触它,你再次当选的政治目标就黄了。这太糟糕了,因为尽管大家都不愿意,但任何讨论都要触及这三个话题,涨税、削减津贴和延期支付退休金。政客们如果提起这些议题,他们再次当选就会失败,所以他们索性什么也不做——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他们大选失败,他们将不能够再为你和你的孩子们去争取了。我认为常识告诉我们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如果政客们真的在乎的话,他们将停止继续出血的行为。他们将停止消费。但他们没有。只要他们能够当选,他们的病人是死是活对于他们没有影响。

这些淫荡的政治家们对我们撒谎,说为社保和医保提供基金,他们和那些鼓吹“免费”基本医保的人没有区别。我们没有指着他们的历史记录歇斯底里地大笑,我们只是坐在一边倾听,认为这次也许会有所不同。

当政客们需要钱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列出一份清单,他们的计划中有大量过于乐观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当奥巴马总统提出一个 6340 亿美元的“基本医保备用基金”时,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个计划并没有说明资金从哪里来,谁负责出资或者如何花费这笔钱。

常识告诉我们,根据我们以往处理社保托管基金的经验,关于另外一个“后备基金”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雇主告诉他的雇员他将开展一项医保计划,他要求雇员付钱,按月提取本金,但却不告诉他们钱去向何处,或者该计划有什么收益或者特殊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雇主将会坐牢。

我们中有多少人在没有对一辆新车试驾前,或者对车并不了解时支付预付款?但这正是华盛顿的疯子们提出的建议,他们撒谎说社保和医保方案有偿付能力。

如果我被愚弄一次,你没面子,如果我被愚弄两次,丢脸的就是我了。骗了我 70 年,要我支付 100 万亿美元,而我只是坐在那里被动接受?我们会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感到惭愧。

如果我们不大声反对这种疯狂行为,那我们就准备坐以待毙了。塞缪尔·亚当斯说,那些喜欢“被奴役的安宁生活”的人将“蹲伏在一边,舔着喂养人的手”。这句忠告在今天一样有意义。塞缪尔的结束语是:“锁链轻轻套在你的身上,你的后代将遗忘你是我们的同胞!”

但这不是全部! 现在行动起来,我们这次的金融崩盘也要包括在内!

现在一切都开始崩溃,我们的政客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许诺走出危机的方法就是继续贷款花掉上万亿美元。我们相信他们的谎言,因为听起来很中听。我们关注任何一个好消息,他们说船已经避开冰山,没有下沉。

但它的确在下沉……救生船也是一样。

拿船做类比很合适,不仅因为我们这艘被击中的船在一片未知的海域里下沉,而且我们把船的控制权交给了一位为竞争对手公司卖命的船长。

目光短浅的政治精英们炫耀地说,中国拥有价值7240 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中国已成为我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政治精英们骄傲地宣称中国是如何愿意购买我们的国库债券,这反映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未来充满信心。但他们在精心编排的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到的是,中国已处在支配我们未来的地位,因为它能带来一场我们从未见过的危机。这不需要导弹或者军队来完成——只需要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出售我们所有的债券,或以高昂的利率回报要挟,作为他们继续购买的条件——这种很多人都担心的事情不久就要发生。

常春藤名校出身的人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如果中国出售我们的债券导致我们的经济崩溃,中国也将失去他们最大的产品出口市场,意味着他们的经济也将被削弱。这是很合理的——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的领导者心中,比智商更缺乏的是逻辑。

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家庭版的剧本吧。假设这不是发生在北京和华盛顿,而是发生在你的家里。几个月前你失业了,没有告诉妻子。为保持对旧日生活的幻想,你透支了你所有的信用卡、现在你连极少数额的现金都很难支付了。

如果你不再出去吃饭或者购物,妻子就会发现问题,所以你继续在外吃饭,购买漂亮的东西。几个月过去了,你积累的债务高得恐怕你再也无法还清了——即使你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的话。情况更糟糕的是,你还偷税漏税,在填写有关失业文件时,你也谎报内容。

情况开始恶化。收款员和国税局审计员找上门来,你在妻子面前冲他们大声喊叫,说他们的账面数据记录出了错。

情况越来越糟糕。你开始相信你自己的谎言。你想自己买彩票肯定中大奖,然后在便利店里把另外几张百元美钞递给售货员买了彩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想到在下一轮彩票摇奖之前还要等一些时间,你从唯一能借钱的地方借钱:高利贷。他们告诉你要以高利

息还债,而且必须在周末就要全部还完。没问题,你心里想——你能找到办法,你只是需要一些呼吸的空间。

你借了高利贷的钱,很自信,幻想下一轮摇奖赢得头等奖。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带着妻子去赌场玩,输光了所有从高利贷借来的钱。第二天开奖了,你又没中。现在你的信用卡除了几千美元的账,你将因诈骗罪面临牢狱之灾,而且更糟糕的是,高利贷债主威尼将在这周末上门讨债,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威尼总能把欠债要到手。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所处的境地。

一种解决方法就是继续犯法来阻止威尼和其他讨债人。我们正在以极其危险的速度加快钞票印刷机的工作效率,这有些类似仿造,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抵押品来借钱了。

我们的战略和那些抗击癌症的医生所用的方法很相近。实际上,医生们把毒药输入到癌症细胞中去,藉此希望在癌症杀死患者之前用毒药杀死癌症。这是一种细微的平衡,可能产生潜在的致命后果。但医生们很

小心,他们有对策也有退路。但我们没有。

我们以大剂量的化学药物对抗癌症……同时也在毁灭我们的身体。没有医疗平衡手段、没有计划、没有退路策略,尽管这个医生之前已经有一系列可怕的、威胁到生命的治疗记录,我们还是继续看同一个医生。什么时候我们能意识到应该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呢?

最糟糕的是,玩这套把戏的阴险的毒蛇早知道这招不灵。为什么?因为这个方案从来没起过作用。但是他们知道,和私营企业或者公司不同的是,政府从不会破产,因为政府总能靠印制钞票来还债。

去问一下生活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德国人或者现在在津巴布韦挣扎度日的人,极度通货膨胀是不是真事。就像在今天的美国一样,那些国家也曾认为极度通货膨胀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头上,或者他们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可怕后果。但他们错了。

所谓的专家们分析了这种怪异的过度消费方式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然后总结出结论说,我们的命运将

和那些走同样道路的人完全不同。我很抱歉,我是不是漏掉什么内容?他们一遍又一遍“疯狂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花太多的钱和购买我们的国债将使我们的美元贬值,其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就是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我们需要的东西。这就叫做通货膨胀,这是自然法则之一,这是当权派们很快就要面对的现实。

我们留给后代的遗产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受外国债主们的奴役——必须停止这种疯狂的举动。拯救我们国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三章

政治武器的选择：美国税法

1913 年开始制订的美国税法已经从当初的 14 页增加到现在的 67,000 页。当年政府的承诺是仅向占人口 1% 的美国最富有阶层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后纳税的覆盖面不断扩大，1939 年全国 5% 的人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二战”以后这一比例已占全民的 75%。为了缓和赋税重压，政府做了它经常干的事情：把名称改一下。当“反恐战争”被认为太富有侵略性时，被改名为“海外应急行动”，认为这样听上去会友善很多。这种想法还体现在我们的税务机构上。“国税局”被改名为“税务服务局”，按照总统的说法，强调其“工作中提供服务的方面”。

听上去像是带着微笑面容的法西斯主义。

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六位候选人或许被复杂的税法弄昏了头脑,或许他们只是想诈骗政府的骗子。但因为他们在政界已混得很熟,国会大度地原谅了他们的税务问题,称之为无心的过错。

但如果他们不是无心犯错呢?如果我们政府的高层官员和那些入狱的漏税犯卫斯理·斯耐普斯和理查德·海切尔没有区别呢?这两个骗子都是无心“忘记”申报他们在电视剧《生还者》中赚得的百万美元收入。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不知道,因为媒体和大众都背离了共和国的原则。为什么没有人要求这些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在电视听证会上发誓、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呢?为什么没有人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进行严厉惩罚呢,即使这只是个错误的话?别忘了,如果是你漏报收入的话,我十分肯定国税局将不会接受“抱歉”,“我忘记了”,或者“我使用的是特帮税务软件”(Turbo Tax 软件是美国公司开发的一种用于在网上申报缴纳收入税的软件。译注)的说法作为借口。

这又使我们把目光投向已经承认违反税法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盖特纳负责将美国带出经济危机,他的工作是管理国税局,贯彻他自己都未能遵守的税法。

这样的一个人,之前称他是唯一一个足够聪明胜任财长工作的人,但在支付自己的收入所得税时却不够聪明了?他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在计算自己的税单时却不够“杰出”,即使他的雇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帮他计算出来,支付给他一张支票,他也签了字,承认知道这张支票是用来纳税的。

哇,我当然希望他认识到,政府财政赤字不能通过简单的加税方式来处理。

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兰戈尔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这意味着他负责制定税法。但很显然,他并不够机灵胜任这份工作。据称,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蓬塔卡纳游艇俱乐部有一处别墅对外出租,但其75,000美元的租金收入却没有交税。他自己的解释呢?他说他不知道在多米尼加出租地产还要上税。

目前,对国会议员南希·佩洛西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她被称为是“最道德的”恪守国会承诺的议员,佩洛西说要在2009年1月份之前发表一份完整的会计报告。也许他们使用日历的方法和计算税额是一样的算术方法,1月份到了,过了,接着2月份、3月份、4月份——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看见这份报告。但他们却花了大量的时间重新任命国会议员兰戈尔为筹款委员会主席,以便他能够同时继续监督税法的起草。

如果我们假定他们都是无辜的,假设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无心犯错的,那么常识告诉我们,税法是不是稍微复杂了些?

我们的税法不仅仅是为政府创收。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将按照俄罗斯的模式(是的,那个俄罗斯)建立一个容易执行、难以逃税的统一税制。

在进步主义的收入税体制下,税收等级不同、税额减免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俄罗斯人收税并不容易,遂改为统一税,结果令人吃惊,效果迅速。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运用统一税率缴纳的税收提高了25%(根据通货

膨胀做了调整),自愿依法纳税的比例上升。

和俄罗斯不同,我们很不幸,我们每年的税收制度都变得更复杂化。有多糟糕呢?美国人要花上 76 亿小时来办理和税收相关的事务。这就意味着要雇佣 380 万全职人员来做与税收相关的准备工作,并完成全年所有的税务。2006 年,美国人花了 1930 亿美元来贯彻税法。

为什么耗时那么长,成本那么高?因为免税代码每年都在变,仅去年就变了 500 多次。这么做有以下两个简单的原因:

1. 使特殊利益团体享受到恩惠,这一点隐匿于复杂的法律框架中。
2. 免税代码可以杀人于无形,找不见外伤和碎骨;也可以施人以恩惠而不留痕迹。

这就是华盛顿的现实。如果你是当权者的一个朋友而没有缴税,那只会被看作是你的一个疏忽,不影响你成为财政部长。但如果你与当权者为敌,那么同样的错误就会使你身败名裂。最近的例子看一下水暖工乔

先生吧。这其实并不是新的政治策略。你认为马丁·路德·金被判定为偷税只是一个巧合吗？当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发表言论反对政府时，却同时要接受违反免税代码法规的调查时，也是一个巧合吗？

一部复杂而令人费解的税法就是要挟敌人的武器（如对石油公司增收利润税），惩罚无辜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如对公司高管征收 90% 的税），而对自己的朋友实行税额减免或免除，让个人钻法律的空子。

有句话这样说，“征税的权力就是破坏的权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权力。华盛顿有太多的人忘记了老老实实在地挣上 1 美元要付出多少血汗。我相信，如果我们让那些政客们花上 6 个月的时间采摘水果、倾倒水泥或者在餐厅做服务员，他们对于合理花费纳税人的钱这一职责的神圣性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被要求以体力劳动，而不是金钱的方式来纳税，我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制止疯狂烧钱的

行为了。

比如,如果一名屋顶建筑工被要求建造 20 栋新房屋,而不是去缴税,或者一名汽车修理工被强迫修理 50 台新发动机,来还欠政府的债,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起来反抗这种浪费的花钱做法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钱很容易赚,但时间更宝贵。但常识告诉我们,两者是一样的:时间就是金钱。

我们现在应该取缔国会利用税法贿赂或惩罚公司的权力了。如果公司犯了法,运用刑法而不是税法来惩罚。公司和个人的成败都应该靠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依靠国会给予的减税、津贴和其他好处,而这些恩惠常常是国会用来收买选票和拉拢选民的方法。

如果这一切都不起作用的话,我们应该按照托马斯·索威尔曾经建议的,将选举日改为 4 月 16 日。(你是否注意到选举日和缴税日在日历上的日期尽可能隔得很远?)要想让这些人对于他们花我们钱的方式负起责任,就让我们在缴税后来决定他们的前途吧,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吗?

和钱没有关系,这是关于法治的问题

进步主义运动(在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期进步主义者建立起现代所得税制度)将美国视作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两者间不是细微的差别,我们建国先辈们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认为民主常常会导致暴民统治。

但是进步主义者(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认为民主权力源自于人民。如果人民觉得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太过分,他们可以为了全体大众的利益创造平等竞争的平台。

自那以后的百年间,一切没有太多变化。

与其说制订税法是为了增加收入,倒不如说是政府利用其来惩罚对手、帮助朋友,或者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建立一个“公正的”体制。政府援助也是一个道理。所有那些公司真的需要钱吗,或者政府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挟公司,从而实现对公司的某种控制?

这正是奥巴马总统的总参谋长拉姆·伊曼纽尔说这番话时的意味，“你从来不想错过一场严重的危机。我的意思是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做一些你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尽管伊曼纽尔是名民主党党员，但这不是党派情绪，共和党人也一样是投机主义。

法治就是要防止危机被利用，争端的结果应根据一套严格的原则来裁决，而不应受到本能情感、知名度、政治权力或者资金实力的牵制。但是这种观念只是另外一套“传统价值观”而已，如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的人所说的已经“结束”了。看以下的例子：

- 针对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高管按合同合法领取红利的行为，美国众议院利用其权力通过一项议案，对其红利征收 90% 的追溯税。

- 对于按合同领取奖金，却不愿把钱自愿退回来的 AIG 公司的雇员，纽约州首席检察官安德鲁·科莫威胁要对其姓名予以曝光。

- 通用汽车公司被要求解聘其首席执行官作为接受政府资助的前提条件，尽管这名首席执行官并没

有从事任何犯罪活动或者有渎职行为。

- 银行高管们被胁迫必须接受政府资助,否则将面临检查和审计的风险;政府官员正在运用权力,抓住任何一家——仅以他们自己的看法——会造成“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公司。

- 神圣的“无记名投票”正在受到工会领导人的攻击,他们认为招募新成员加入比保护自由选举更重要。

- 政府暗示它将强迫各州接受联邦政府的刺激资金,即使州政府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已经考虑立法,将对高薪人员追溯增加收入所得税。

- 富人们因为富有而遭到诽谤,成为攻击的靶子。(阶级福利在政治上总是很受欢迎,但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不能守住他们挣来的东西,那么他们就没有工作的动力。)

- 常识还告诉我们,政府对富人实行的政策最终会对穷人产生滴流式效应——请记住,1913年时征收的收入所得税仅适用于全国最富有的1%的人。

- 美国国际集团(AIG)、房地美公司和房利美公司的高管们都得到联邦政府的救济,并已获得几十亿美元的公司福利。

- 所有公司的高管们都拿到了奖金,但 AIG 公司的高管们却被国会和工会盯上,房地美公司和房利美的高管们因为和政府的关系,都没受太多的注意。

这些都合乎法制吗? 必须停止这种违法行为。

非洲裔美国人早就理解了什么是双重法律。一部法律为白人服务,另外一部则是针对黑人的。我们在纠正社会不公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现在却和社会其他人背道而驰。我们使制度如此腐败,以至于很多人希望司法能“同情”他们的感受,而不是视而不见。

一旦这颗种子生根下来,我们的制度将失去生命力和保障,因为复仇将成为实现“公正”的唯一方法。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按照规矩办事,却不得不帮助那些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使得人们质疑制度的公正性,这种制度让冒险的人们获得高回报,还保护他们不承担任何后果或损失。

现任总统和政治领导人不断地向我们保证说,给予政府更多的权力是唯一的出路,乔治·华盛顿站在过去提醒我们说,政府常常是问题所在:“政府不代表合理,

也不能只说漂亮话,它代表强制力;像火一样、是一个不安分的公仆和一个令人畏惧的主人。不要让政府有做出不负责任行为的机会。”

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并不这么看。最近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3%多的美国人认为“资本主义”比“政府主义”好。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则认为政府主义更好,还有27%的人则“不能确定”。

醒来吧,美国!说资本主义仅仅与金钱、公司、贪婪的商人和做幕后交易的腐败政客有关的话是个谎言。资本主义不是关于金钱,它和自由相关——是尝试和失败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美国在1905年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这种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却似乎急于摧毁它。

这份民意调查让人感到可怕的部分是其暴露了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下一代人的想法。在这群被调查者中,意见分歧基本是平均的:37%的人青睐资本主义、33%的人倾向于政府主义,还有30%的人不确定。

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使美国回到其立国根基上去——这个根基是大部分人甚至没完全理解的。我们建国先辈们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以联邦条款为基础,这部条款创建了一个尽可能微小的国家政府。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政府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但政府就是一个“活生物”,总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寻求增加权力。折中的方案就是给美国一个最瘦小的政府,让它从那儿生长。

但这没起作用;政府太弱小了。所以我们的爱国者们又做了一件事情,一个炎热而潮湿的夏天,55人聚集在费城起草了一份新文件,这份文件使政府的控制稍多一些,这份文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当有美国人说政府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时,他们基本上在说宁愿受国家的领导和喂养,而不要自由。或许是出于无知,他们希望国家加强对个人决定的管控,认为政府的管控对于个人来说有得必有失。

那些渴望自己的手被政府牵住的人承认他们是绵羊,愿意被自己的主人剪毛和被改造。随着经济危机的

加深,饥饿和恐惧几乎总会使人们奔向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安全”这个词被定义为“完全政府主义”,这种定义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政府早已证明是一个悲惨的、自私的和暴力的主宰者。从希特勒、墨索里尼……政府下逃生的人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读一下他们的故事,你就明白你需要知道的。

第四章

政治阶层的优待和特权

你会申请这样一份工作吗？

自己做自己的老板。绩效考核做好了，但片刻就被撕成碎片！自己犯错误，却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不计后果。不管工作表现如何，照样领取着 6 位数的薪水，年薪每年自动上涨；享受着高等医疗津贴，领取公共补贴和丰厚的退休金，一年只需在现场工作 118 至 184 天，然后待在家中工作……或者还有更多！环游世界，参加精美的鸡尾酒会，一切都免费。定期地会客，尽管客人认为你业务上无能，让人讨厌，但因为害怕你，表面上还得称呼你“先生”或“夫人”。

如果上述对一名国会议员工作的描述是坦白而真实的，那么，只有两种类型的人会申请这份工作：吉姆·

斯图尔特所描写的理想主义者——史密斯先生,或者一个骗子。理想主义者会被反腐败的使命所吸引,骗子们着迷的是这个职位带来的权力和快乐。

我们需要发现更多的史密斯先生,消灭骗子。

国会:美国的贵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首先打出“反对富人阶层”牌,并把自己定位为“人民中的一员”,其实,他们的收入与他们所说的“恶棍”相比,只有 26,000 美元年薪的差距。

普通美国人的年薪在 4 万至 5 万美元之间,而我们的国会议员每年装入口袋的年薪则达到 17.4 万美元——这个数字比全美国 95% 的家庭所挣的薪水都多。我并不嫉妒别人凭能力赚很多的钱,除非他们赚的钱(a)从我这儿偷来的,或者(b)让我受罪。我们的政客这两点都占上了。

成为美国 5% 的上流社会人士,对于国会里的贵族们来说还不够,他们给自己准备了额外的好处,比如享

有健身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在里根机场和国会山免费停车,在自己的咖啡馆里招待会员用餐、不会受到那些“下层民众”的打扰,这些“下层民众”正是他们一贯声称要“为之服务”的人民。

上述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泡沫圈,将我们的国会代表们包裹在其中,这使得他们很难理解美国人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然,他们会说他们知道失业或者房子被抵押无法赎回的感受;但即使他们“体会到这种感受”,要赢得下一场大选,他们真的在乎,或者他们真的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像他们所代表的“普通美国人”一样生活,对于国会来说,真诚的做法就是遵守他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让人惊奇的是,国会一直在告诉人们“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学我所做的”,直到 1995 年,国会才被迫完全遵守下列联邦法律:

- 1938 年公平劳动标准法
- 1964 年民权法案第 7 节
- 1967 年的就业年龄歧视法
- 1970 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

- 1973 年康健法
- 1988 年雇员测谎保护方案
- 1990 年美国残疾人法案
- 1993 年家庭和医疗假期法案
- 联邦服务劳资关系条例
- 美国法典第 43 章第 38 节中关于退伍军人就

业和再就业的权利法案

- 劳动者调整与再培训通知法案

1995 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迫使国会开始遵守他们在几十年前就制订的、涉及不同领域的法律?是两次大的革命,这两次革命都在前一年爆发了。首先,控制国会长达 40 年之久的民主党被逐下台,第二,竞选议员的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是新面孔。因为他们以负责任的态度开展竞选,且有足够多的有批判精神的民众推动他们进行改革。

事后看来,在那场政治革命中,做出的承诺和爆发出的潜力都如昙花一现,结果是理想主义者或放弃或失去了席位,投机主义者追逐权力抛弃了原则,但那些选举至今还提醒着我们,当有足够多的人摒弃党派偏见、

支持优秀的候选人时,真正的变革是可能发生的。

政客们不会改变,他们的虚伪也不会改变。国会现在正在推动立法,便于在工作场所组织工会。但国会的立法委员会却没有成立工会。他们想要破坏的是你我的“秘密投票”,但同时却为自己保留召开领导层闭门会议的权力。

他们不想受到这些法规约束,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或者,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想受到工会的规章、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约束?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似乎毫不犹豫要把那种工作方式强加在我们身上。

关于教育问题,许多政客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或者教会学校去读书,同时阻挠、防止别人也这样做。如果詹姆斯·麦迪逊知道这一点,也会惊讶于我们创建的双重标准。

[国会]……制订的法律不能只是管辖社会大众,而不适用国会议员自己和他们的朋友。法律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策能够联系统治者和人民的最强的纽

带之一。在他们之间达到利益共享和感情沟通,很少
有政府在这方面能成为典范;但如果没有这一点,每
个政府都会退化为专制——如果这种精神被压制,允
许一部法律对人民的约束力不等同于对立法机构的
话,那么人民将准备接纳除自由以外的一切事物了。

这些人尝试了,但却总和先辈们的原则脱节,一次
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因为这一点看不起他们。我
们为什么不坚持把他们选下台、让一切重新开始呢?我
们是不是真的信了他们的谎言,认为没有人能够胜任他
们的工作?

我们需要扫除国家弊政,选举出只对我们和宪法负
责的新的领导人;我们必须要求实行一个政治上“相互
保证毁灭”的政策;那就是每一部施加于人民身上的法
律都必须以同等效力适用于那些制订法律的人。

政客:在位之长,比蟑螂的耐力还强

政客们和蟑螂一样,不是愚蠢的动物。两者都有不可
思议的生存能力,所有死的或活的东西都可以当作食

物,没有头颅也可以再活一个月——我认为政客们存活的时间比这更长。

一个民意支持率仅为 13% 的国会,但选举中 95% 的现任众议员和 88% 的现任参议员能再次获选? 常识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不可能同时发生,但的确发生了。为什么? 因为经验丰富的老政客们早已制订出对他们自己和两个主流政党都有利的游戏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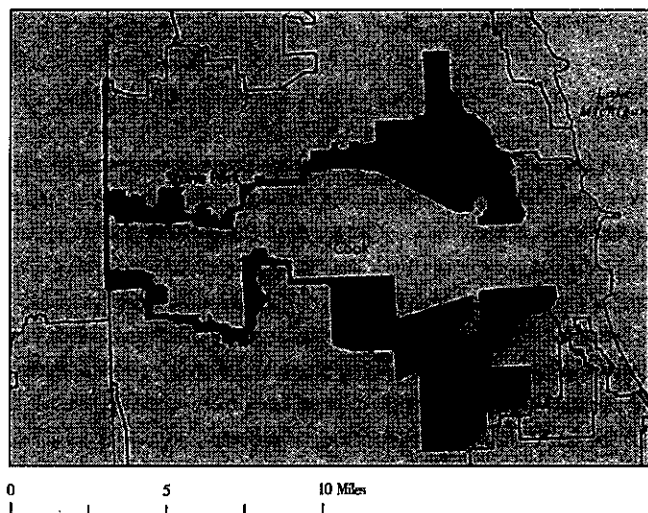
2008 年选举时,普通的在职众议员平均募集了 1,356,311 美元,对手募集了 336,585 美元。在职参议员募集得更多,迅速获得 8,804,631 美元的选举赞助金,对手则平均少了 87%,为 1,155,599 美元。

不管你传播的思想有多么伟大,如果你没钱,就很难赢得大选——这就是为什么选举财政法能帮助政党巩固地位的原因。但这不是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唯一原因——还有选区的重新划分,即我们所说的“不公正的划分选区”。美国人希望选举公开公正,但重新划分选区就是要使这一切不可能。怎样做? 很简单:通过人为划分选区,使该选区对某一个现任官员或政党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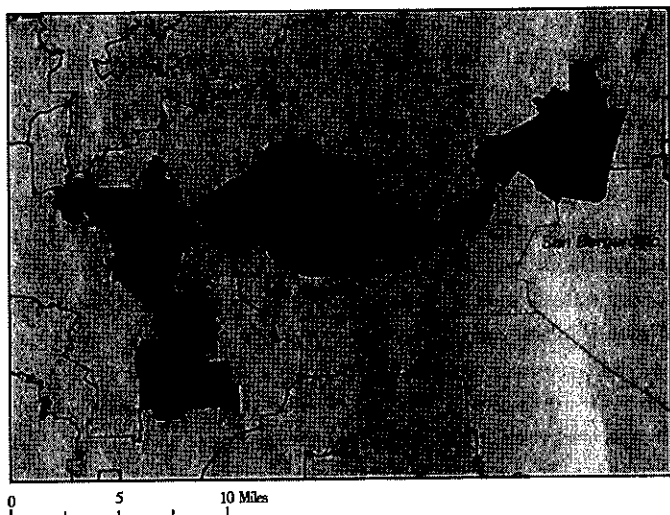
这样,政客和政党继续执政的机会就大得多。

实际上,政客们能够决定选区里有他们所期望的选民,包括所需选民的种族、宗教信仰和收入水平。他们甚至可以决定在街道的哪一边划分界线。总之,他们在选择选区里的居民。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选择代表,还是他们在选择投他们票的选民?

这张图上的深灰色区域显示的是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代表路易斯·古特瑞的第4国会选区。古特瑞1993年从政至今,他的选区面积为39平方英里——看看这儿,请告诉我华盛顿是否还有常识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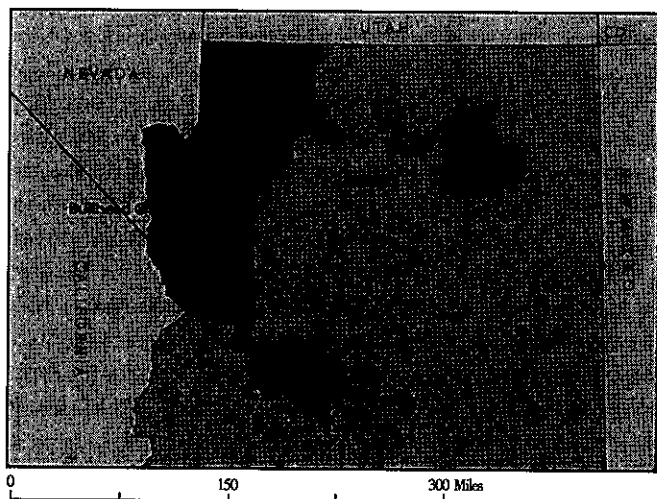
下图是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代表格蕾丝·娜波丽-塔诺的第38国会选区。面积为105平方英里。这块选区被划分出来是为当地居民谋福利呢,还是只服务于某一个政党的利益?



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代表特兰特·弗兰克的第2国会选区,选区面积为20,391平方英里,比罗德岛、新泽西和特拉华加起来的面积还要大!不是因为距离让人吃惊,而是这片区域被划分的方式。

当国会选区按照某些政客或政党的利益被划分时,

你的声音就被淹没了。我们都愿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世界,我们的选票起决定作用——但在日益变化的选区中,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为选区划分辩护的人会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有相似关注点和条件相似的人集中起来,但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

选区重新划分并不仅限于上述这三块区域,两个政党通过划分选区产生并保住他们的“安全席位”。我们的建国先辈们并不希望任何政客的职位永久地安全牢靠;他们希望我们选出的代表对人民有所敬畏。

选区划分还有另外一个不好的方面。把选区从大的地理区域中划分出来,这种方式破坏了我们的集体意识。大部分时候你对你所在选区的边界并不完全了解,也不知道住在街道对面的邻居是不是也把票投给了同一个代表。但这正是政客们所需要的。通过模糊界限,在职政客们能够避免思想相近的人聚在一起,以防对他们构成威胁。毕竟,当你不了解邻居、不知道该敲周围哪一扇门的时候,就很难组织起一个聚会。

托马斯·杰弗逊理解把社区聚集起来的政治意义。他倡议建立称作“选区”的政治区,这样,具有相近兴趣、利益和需求的人们就能聚集在一起讨论,在和政治领袖商榷之前,选民们预先形成一个统一意见。就像杰弗逊所说的,把国家分成如此大小的若干个选区——这样每个公民在被召唤的时候都能亲自参与。个人通过选区在国家中行使和自己相关的政治权利。政治行政区如果太大的话,就会导致人民的声音“不能完整地或者错误地被表达”。

杰弗逊计划的简明和智慧反映在各州的分布上,州由很多相互对称的6平方英里的乡镇组成。今天的政

客们不但不效仿这种布局,反而摒弃自然边界和社区联系,选择了毫无逻辑可言的弗兰肯斯泰因式地图。

金钱和选区划分仍然是“把懒汉扔出去”的两大主要障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会议员比国王和独裁者的任期都还要长。比如,参议员罗伯特·伯德任职长达半个多世纪,众议员约翰·丁格尔任国会议员已有 53 年的历史。英国的亨利八世也只在位 38 年。伯德的任期比菲德尔·卡斯特罗还长!卡斯特罗在任 49 年后决定退任。

美国政治意在使候选人代表主流思想,远离边缘化集团利益。“赢家通吃”的方法就是迫使候选人转向主流路线,以便获得最多的政治支持。这是为什么我们两个政党通常会如此相似的原因——他们都是在争取同一群选民。但这不是正常的选举环境。我们的政党没有在争取主流民众,他们是在争取一小部分团体的利益。那不是我们选民所在的地区,那是重要选民所在的地区。既然选区划分可以使政客们选择选区,那么竞选者的精力也就集中在如何去影响那些重要选民。

我们的体制本来不是那样运作的。乔治·华盛顿的两个任期结束后,美国人乞求他继续留任,但他拒绝了,认为这会树立一个坏的榜样。杰弗逊以华盛顿为榜样,也拒绝留任第三个任期,强调“历史显示,(长期担任公职)是多么容易堕落为继承制”。

当然,富兰克林·罗斯福并不在意华盛顿或者杰弗逊的想法。他连任四个总统任期——治理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我们在其后通过了第22宪法修正案,保证这种超出任期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今天,我们近代的政治皇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为了国家的利益再也不想退出“家族生意”了(不要让他们欺骗了你——“家族生意”正如其名)。

我们再次处在十字路口。总统的权力可能被限制,但盘踞在华盛顿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却失去了控制。这是为什么我们该做些政客们非常熟悉的事情了: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规则。

那些品德有问题不适合担任公职的人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控制其危害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所有公务员的

任期加以限制。本·富兰克林坚持认为为国家效劳不是一份全职的工作或事业——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的公务员们必须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去,不再接受他们习以为常的不道德的额外补助。

任期限制会不会使一些优秀的政治家离任过早呢?就像谚语中倒掉洗澡水也倒掉婴儿的故事。答案是肯定的——但和我们获得的自由相比,这个代价是很小的。摆脱腐败、贪婪和傲慢,更重要的是不受那些将自己的事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人们的影响。

我们要发挥的作用很简单:你必须区分并支持那些坚决拥护严格任期限制的候选人。对于那些持有“工作只是暂时的”论点的候选人,值得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必须把任期限定的问题抬高到和全球变暖、移民、税务,或者其他问题同等地位的高度,否则如果我们失去了共和国,这些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政党:看似不同,实质相同

就在不久以前,我还相信我们的政党实际上是有立

场的。转念一想,我仍认为他们是代表着什么的,只是代表的不再是我所想象的。

两个政党关心的唯一原则似乎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大选”。这就是真相。不要相信他们的谎言和宣传,说我们的政党关心着我们——他们其实不关心。候选人的价值观、判断力和品行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他们的政党属性。在任何一个政党成员的身上,你都能找到价值观和原则,在任何一个政党里,你也可能发现罪犯、坐过牢的人和早期反社会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党在有意制造问题,以便他们以后进行整治(最后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问题越严重,我们越需要他们在身边。但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只是个谎言。过去 25 年间,称自己是“独立主义者”的美国人的比例已经从 11% 上升至 25%,这在对抗两党制的战斗中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如果你遭受某一个政党的洗脑,那么现在是重新认识的时候了。替代两党制的一种新制度已经存在,有 25% 的美国人称自己是独立主义者。我们需要利用这

一点。局势很危险,时代呼唤独立思考,要我们改变对任何政党的盲目效忠。

本章最后一个自然段是针对阅读本段落的任何一位政客而写的。民主党人认为总统布什的消费方式将美国拖入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式的经济模式,你站在哪一边?站起来吧,人民将支持你。共和党人,你真的认为乔治·W·布什的国防政策是我们所关心的吗?所有认为我们的共和国已处于危急关头的人们,请宣布你独立。

我们把票投给共和党人,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开支费。我们投票给民主党人,得到的也是一个更大的政府和更多的开支。

我们投票给两党的候选人,他们承诺建立道德政府,但共和党人给我们带来的是白宫丑闻,民主党则有查理·兰吉尔、房利美公司以及做徇私贷款交易的克里斯·多德相继传出丑闻。(注: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查理·兰吉尔 2008 年陷入优惠租房、给儿子谋肥缺等丑闻。)

我们支持的候选人告诉我们,他们想要的是透明和信任,但我们却始终看不透究竟谁是“政治分肥项目”的幕后策划,或者是在最后一分钟把条款塞入法案。

我们还需要更多政客们背弃承诺的例子吗,才能看清楚这些政党都来自于同一个污染源头?两个政党都被传染上进步主义——这种主义要求你的个人权利要服从于政府权力,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的个人自由(更大利益是政府政客和官僚常定义的一个词语)。

自建国以来,我们共有的经历教育我们,各种形式的政府在本质上都是法西斯。除非受到遏制,否则他们贪婪地攫取尽可能多的金钱、资源和人力。政府永远都不停歇;他们总是在增长。法西斯主义、政府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都是殊途同归,那就是:专制和政府个人的绝对控制。所有这些“主义”都简单反映出这样一种错误理论,那就是需要进步的、更大的政府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两党体制就是一个烟幕弹,两党通过表演大量的

“激烈”辩论、争论和政治上的互相攻击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说得多,实际做得很少。最好的类比就是电影“十一罗汉”,影片中,一群小偷抢劫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货车由小偷远程遥控逃离赌场的停车场,最后停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场,警车一直在后面追逐,而小偷们其实并不在货车里,他们还在赌场,此刻,小偷正怀揣着大量现金大摇大摆地走出前门。这个障眼法就这样把警察骗过了。

政客们在毁灭我们的经济。他们劫持私营企业,偷我们的钱、盗走我们孩子的未来。布什就是这么干的,奥巴马现在也这样做。但我们被骗过了,因为有红鲱鱼搅乱了我们的注意力,比如我们的注意力被错置在关于哪一个政党更不负责任的辩论上。

我等待着民主党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进行驳斥,因为他们认为书中斥责的对象就是他们。我也等待着共和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对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予以攻击。二者的看法 100% 是对的。

不要犯错误,这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战斗。

“我们”是指相信自由的人,就像独立宣言开篇几行所描写的那样。“他们”是指一些认为自由的定义会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人。

政客们,我有一个信息要告诉你们:美国人并不在意你名字后面是字母“R”(共和党)还是“D”(民主党);事实上,那些字母可能害了你。我们关心的是你的品德。美国人并不需要一个和他们意见始终一致的人,而需要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人。我们想要参与公开、透明、公正的进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兑现你的承诺。我们可能召唤你,但如果你履行了你的承诺,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总会监督着你。

让我们成为我们时代的极端主义思想者,并记住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讲中给出的关于常识的警示:

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持久的、令人讨厌的,抑制或者约束它服务于一个明智民族的利益,也是民族义务之体现。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别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

大发,变得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正是乔治·华盛顿所警示我们的。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关心解决问题。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起他们自己小小的政治帝国,让“他们的人赢得选举”,而我们的国家遭殃。那不是领导力,而是民族谋杀。他们争取政治支持或者募集献金的方式是让我们互相对立,煽动我们在诸如堕胎、枪支控制、移民、同性婚姻等一些问题上互相争吵,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争吵得越厉害,问题越不容易解决,他们的职业生涯就越安全。每一次你投票“反对”某个人,而不是“支持”某人时,两党制赢了,而美国输了。

当我们支持或者投票选举两党之外的候选人时,立即就有人告诉我们这是浪费选票,这会使两党之中不受欢迎的人赢得胜利。每次大选时,这些谎言都会不断地被重复,我们必须无视这些谎言。

如果你凭着自己的良心投票,你就不会浪费你的选票。需要证据吗?看一下亚伦·斯贝克特吧。2004年大选,第三党派有两名候选人参选,他们都被认为比斯

贝克特更为保守。但大部分保守主义者认为小党的候选人是不会获胜的，所以他们出卖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一个并没多少人认为是真正保守主义者的候选人。

大约5年以后，斯贝克特从共和党转投加入民主党。所以我问你，是谁浪费了手中的选票，是投了宪法和自由党的4%的选民，还是53%的投了斯贝克特的人？这个背叛党派的人玩弄把戏，他转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下次选举中有更大的胜数。

常识告诉我们，在了解候选人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后，投票支持我们选择的人永远不是浪费选票的行为。如果一名候选人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难道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诚实和坦率的人吗？不要再相信他们的谎言！

敌人在太门口已经有些时候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称自己为“进步主义者”，因为听起来新鲜而且有进步意识——但事实恰好相反。进步主义运动隔断了美国人民和建国先驱们的联系，他们所追随的是不断演变的政府主义理论。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能提供一切的政府就有能力攫取一切。醒来吧！我们不再需要一个执政的新党——我们需要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对他们厌烦透顶，对我们自己呢？

美国人民就像恐怖电影中容易受骗的人，似乎总在做愚蠢的事情，下面看电影的观众们大喊着，不要去开那扇门，不要靠近！有一阵子，我们确实听到了这种呼喊。我们没有开那扇门，我们想起来我们是谁了。

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我们的国家。你还记得美国人拥挤着排成一队队等待献血吗？尽管没有人需要输血。你还记得之后星期天的足球赛被推迟了吗，深夜喜剧节目的演员们不再讲笑话，准备出庭的律师们自我约束延迟办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

“9·11”事件之后，我们开始回忆起我们的优秀传统和自我牺牲的力量。我们回到了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我和我的邻居、朋友、家人再次取得联系。“9·11”袭击事件发生4个月后，我们有61%的人

认为国家变得更好了。

但是目光短浅的政客、教授、企业家和其他“专家们”把美国视作巨大的购物商场，他们不喜欢人们的这种变化。如果人们又相互熟悉了，他们就不可能购买什么东西了。如果人们停止消费的话，那么整个庞氏计划的崩溃就会比专家们预期得要早。

电视台的高管们有意使电视节目充斥着暴力、谋杀和性的内容，不再播放飞机撞入帝国大厦的画面，解释说画面太“恐怖”、“令人痛苦”，让大多数人难以承受。

这只是另外一个谎言——但它奏效了。我们不再去想“9·11”，不再去想我们的自由是多么脆弱，我们只是听从布什总统的意见去花钱，“去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带上你的家人尽情地去享受生活。”

结果是，现在仅有 21% 的人相信我们的政府比“9·11”之前更好了。我们又回到 2001 年 9 月 10 日——我们把头埋在沙堆里，手伸出来，等待下次发放的“免费政府津贴”。

加利福尼亚就是一个主要例子。十年间，他们的预

算从 750 亿美元涨到 1450 亿美元——州政府开支增长了 92%。他们用纸牌搭起来的屋子已开始倒塌。加利福尼亚去年的预算赤字为 420 亿美元,但他们还是不愿按照常识做事回到正轨上,对沿海油田开采的限制仍然没有解除。实际上他们做的恰好相反——企图再次启用已使他们陷入麻烦的财政计划来摆脱困境。他们最近做出一项很有天资的举动是向自己出售债券——这就像跟自己妻子借钱差不多。如果他们不愿牺牲自己,那其他地区的人又有谁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呢?

我们再次身处一个“考验灵魂”的时代,这个时代将被历史学家记作一个伟大而危险的时代。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我们将被看作是时代的英雄,还是那些为了满足私欲和胃口而丧失了最宝贵东西的人呢?

第五章

进步主义的毒瘤

许多人一听到“进步主义”这个词,立即想到自由主义者或者民主主义者——但他们不是同义词。进步主义和政党没什么关系,更多的是关于个人的。进步主义者企图把美国重新定义、改造和重建成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如果和国家的规划和目标发生冲突,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将失去意义。

如果进步主义的毒瘤仅限于被定义的政治制度,那么直接把它隔离治疗,疾病就消除了。但情况并非如此。进步主义已经渗透到两个政党和整个政界——包括官僚、说客、工会和公司,这些集团和个人已经把政府看作是他们的自动取款机。进步主义者对掌控政

党没有兴趣,因为这种想法太渺小了;他们想通过进步主义运动吞噬整个国家。

右翼进步主义者信仰中央集权论,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军事力量实现扩张,左翼进步主义者则认为美国应通过跨国实体、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来实现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

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感到他们选举的候选人都一样、没有区别,就是进步主义在作祟。你是选择进步主义者候选人 A 呢,还是货真价实的进步主义者候选人 B 呢?

进步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重新分配的概念,这种思想是你的金钱和财产属于你自己,但前提条件是国家认为对其没有更高层次或更好用途的利用。在泰迪·罗斯福总统名为“新国家主义”的演讲中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罗斯福演讲中提到了“人类利益”。他说,“私有财产的用途受社会一般权利支配,如何使用私有财产视公共利益所需程度决定。”

罗斯福在财富积累上的观点同样让人惊讶。在上

述这篇演讲中,他说,“只要财富获取的方式是体面的,并且财富被很好地利用,我们不反对个人拥有财富。并且财富的获得不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只要对社会有益,我们就应允许获取财富。我知道,这一点暗示着相比较以往,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将更多更有力了,但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加大政府的控制是必需的。”

作为这种态度的一个反映,你们应该还记得泰迪·罗斯福不仅批准了一项进步主义所得税,而且还是倡导全国医疗保险的首位美国总统。

推进进步主义发展的下一位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认为政府的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这很明显,”他说,“从基本理论上来看,如果政府主义和民主不能说是同一种理论的话,那么二者几乎是相同的。从理论根基上来看,这两种主义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上,那就是社会拥有决定其命运和其成员命运的绝对权力。社会人高于个体人……民主和政府主义的区别不是根本上的区别,只是实践上的区别——是组织和政策上的区别,在主要动

机上没有不同。”

作为他们两党内偶像和哲学理论的奠基人,这两位总统都想要政府有更多的控制权。(罗斯福:“很显然,我们需要对资本化进行政府监管,不仅对公用设施公司监管,还尤其要对包括铁路在内的经营州际间业务的所有公司进行监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两个政党执政效果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在竞选时曾经喊出过什么样的承诺。

就像今天一样,19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者喜欢依赖于“专家”,并把他们当作扩展权力的借口。当进步主义者在美国建立起联邦储蓄制度时,说是方便专家们对金融和财政实施管理。当他们对学校教育加大政府干预时,说是教育学家比我们的父母更懂得如何对孩子最好地教育。当他们设立土地保护区时,说是专家们认为我们一直在滥用土地。当婆婆政府(注:意为对人民管头管脚的政府)的第一轮浪潮出现时,是因为我们的专家认为我们饮酒过度(下了禁酒令),认为我们上税不够(设立进步主义所得税),钱花的地方不对(通过税法重新分配)。

这些都还不够。

1991年,代表进步主义的国会核心小组成立,其成员登记表显示该小组包括70多名众议员和1名参议员。在众议院所有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中,一半来自于该核心小组,该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可见一斑。这些政客可能是进步主义运动中最直言、最极端的成员,但他们并不在少数。国会中还有很多其他议员,尽管他们并不公开宣称他们是进步主义者,但他们基本的思想意识如出一辙。

比如,思考一下前总统乔治·W·布什对大量财富再分配政策的辩护。他是在实施“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物计划”时说这番话的。“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老年人,”他说,“政府将为你支付药费中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你是中等收入的老年人,你药费账单的一半将得到支付。”当然,布什说政府将支付账单时,他实际在说账单将由美国的纳税人、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孩子们来支付。

当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电视直播的总统竞选辩

论时被问到,她是否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时,她回答说她更倾向于“进步主义”,“这个词,具有真正的美国意味,像是回到 20 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年代。”希拉里继续说道,“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现代进步主义者,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有强烈的信仰,相信当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我们大家作为一个社会将更好。”这番话应该是向美国人发出的前进号令,号召美国人回到 20 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年代,去阅读关于那段时期的历史。

即使“保守主义”的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也曾经说过,西奥多·罗斯福是他最喜欢的总统之一。你还在疑惑为什么大选带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因为这些候选人虽然可能来自于不同政党,但他们关于政府作用的思想都来源于同一口被污染的井。

2008 年的总统大选是 1912 年总统大选的真实翻版,在大选中,选民们面对的候选人只是一个进步主义的共和党人和一个进步主义的民主党人。

不难发现我们现任总统的言行与进步主义先驱者有相同之处。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要有

求个人愿意失去个人的成就感,并满足地意识到他的个人活动仅与大众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很恐怖,像是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对水暖工乔的回答,乔担心他交的税会增加,奥巴马说,“不是我想要惩罚你事业的成功,我只是想保证每一个落后于你的人也能获得成功的机会。我认为当你把财富分散出去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就像我先前说过的,进步主义者不仅仅想要建立一个政党,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毕竟,国会议员之所以容易犯错误,是因为他们是被普通人选举出来的,而不是那些使人信任的“专家们”。但那些言语并不仅是说出来而已,还是对行动的呼吁。进步主义年代就是这种呼吁的表现,但还限于此。在上个世纪,进步主义者成功地将我们的国家带向政府控制越来越强、个人自由越来越小的境地——现在他们还在挑战底限。

我想说清楚一点:进步主义者并没有蓄谋使美国瘫痪的计划。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国,确实相信这是美国前进的最好道路。问题是现在反对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不再记述美

国的真实历史,更不用说进步主义运动的真实历史及其目标了。自由自主的原则和我们建国先辈们的理念已经从教科书中抹去,使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对诸如威尔逊或者泰迪·罗斯福的历史人物无从了解。

进步主义者把宪法视作一种活生物,会随时间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进步主义者和建国先驱们都把宪法视作一副手铐——区别在于先驱们认为被铐住的应是国家的权力,而进步主义者则认为,考虑到集体的更大利益,铐住的应是个人的手。这两种立场中的其中一个终将胜出,并决定下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这两种哲学观的战争正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进步主义者在利用几个关键议题,包括环境问题、枪支管制、教育和宗教问题,来推动进步主义的发展进程,当我们在议论这些话题时,思考一下我们的领导人是如何逐渐改变我们观点的,他们避免了一夜之间式的突然改变。早在进步主义被命名之前,詹姆斯·麦迪逊就曾经警示过我们。

我相信在很多时候,人民的自由在悄无声息中被当

权者们逐渐削弱了,而不是通过暴力和突然的攫取方式。

环保运动来得正是时候

尽管阿尔·戈尔可能想到了这一点,但他最终没能发动一场“环保运动”。20 世纪初,有几种电动车和亨利·福特的汽油发动机 Ts 型进行竞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汽车制造商也一直在认真试验氢气燃料。

虽然戈尔没有推出环境责任的概念,但他却和包括乔治·W·布什、约翰·麦凯恩,以及国会进步主义小组成员在内的其他政客一起,找到了一种推进进步主义发展的方法。

乍一眼看来,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环保”这两个问题不像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灵魂的一场战斗。那是因为我们把问题放在真空里的缘故。如果你向后退一步,不是看单棵树,而是去看整座森林,你很快就能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领导人想要加强政府对企业、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掌控,但这不是打个响指就能办到的——他们需要搭乘一辆车驶向目的地。我的论点是,气候变化

这个议题就是他们需要的这辆车。

并不让人觉得惊奇的是,土地保护运动早在进步主义年代就兴起了。山峦协会建立于1892年,二十年后,西奥多·罗斯福宣布,“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比土地保护更重要的事情了。”今天,面对不同的观众,阿尔·戈尔宣扬的是同一种主义。但戈尔没有去和固守成见的大人们宣讲,他很聪明地利用了少年儿童们的感情和本能。在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上,戈尔对一群13—17岁的荣誉学生演讲,他向学生们解释说,当前人们对反全球变暖运动的态度很像几十年前对待反种族主义一样。他告诉学生们,看,有很多事情,你本能上就能理解,但你的父母却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陷在了陈旧的观念里。

这些政客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吗?他们真的相信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拯救”环境吗,抑或环境问题只是他们要搭乘的一辆车,便于他们通向进步主义所梦想的由政府实施全部统治的目标?

和戈尔一样,罗斯福的想法没有停留在言语上,他

要求的是行动。他限制个人自由,无视州的权力,给予政府更多的征税和畜牧权,签署行政令,从而建立起 50 多个鸟类保护区,笔轻轻一画又建立了 20 多个国家森林保护区。这些决定对企业、个人和各州是否有消极影响,或者公民享有这些公共区的权利被剥夺了,他本人并不关心。罗斯福辩解道,“为最大群体的最大利益服务”需要这样的行动。“新国家主义,”他说,“就是将国家的需要放在阶层或者个人利益之上。”

我们今天听到相同的说法。政客们向我们演说,为了“更大的利益”,必然有人失业和工厂倒闭。我们被告知,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开采石油、不能发展核能源、不能燃烧清洁煤。我们的总统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驾驶 SUV 车,不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能全天候把家中的室温维持在 72 华氏度以上。”这些话听上去让人觉得可怕,好像是再现当年泰迪·罗斯福发出的号召,号召人们有一种“新的服务精神、一种新的牺牲精神……我们每个人要下定决心,协力做贡献、努力奋斗,不仅要顾及自己,还要顾及别人”。

20 世纪 70 年代,进步主义者利用“全球变冷”呼吁

人们行动起来。政府的控制自然而然地加强了。20 世纪 80 年代,当科学驳斥了关于全球变冷的说法后,进步主义者改用治理“全球变暖”来争取政府更大的权力和控制。今天,面对长期低温和南极圈增加的冰层现象,又同时出现难以忽视的“全球变暖”现象,进步主义者急于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拥有权力、资源和金钱来对抗“气候的变化”——不管这个气候是朝着哪个方向变化的。

我们被告知,人类正在毁灭我们居住的星球,只有科学家(“专家们”)、富人、名人或者有权势的人才能拯救我们的地球。我猜想,也许因为这群人太忙,他们忙着乘私人飞机参加国际气候会议,却同时指责我们污染地球,他们没意识到自己的虚伪,或者他们认为他们做的工作很伟大,多付出一些代价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不相信政治高层,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虚伪已不再感到羞耻。

就像往常一样,虚伪在华盛顿是最喧嚣的。2007 年,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大声地吹嘘,国会正在

“推进环保”，替换掉 12,000 只白炽灯而改用环保荧光灯。同时，植树和碳排放额度交易活动将展开。

在佩洛西的新闻发布会上，你看不见的是一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发电站，该发电站每年燃烧的煤炭约为 17,000 吨。而发电站的业主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国会。既然发电站的业主是国会，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又控制着国会，那么对于该发电站违反多项清洁空气法案的指控，她难道不是最终应该负责的人吗？

很显然，国会认为自己运营这家发电站无愧，因为它购买了价值近 90,000 美元的碳信用额。碳信用额度是允许一个实体排放二氧化碳，条件是向另外一个实体支付资金，另外一个实体通过植树或者二氧化碳隔离来消除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抵消第一个实体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今年，南希·佩洛西事先大肆宣传的、透过抵消措施和碳排放量的国会计划流于破产。国会将不再购买碳信用额。没有人对这次改变给出解释，国会的尴尬源自有披露说，国会为抵消其碳排放量雇佣的几家公司早在签合同很久之前，就已减少了这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打比方说，你付给某人 1000 美元种

植 10 棵树,最终却发现这些树是他们早在 5 年前种上的,所以你是否真做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善举,或者你只是在安抚自己的良心?在这件事情上国会绝对属于后者。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的那帮傻瓜们应该从过去两年在碳信用额制度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这种制度并没有效果。但相反,他们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决定他们自己不会再购买碳信用额,但美国企业和公司却必须购买。

就在他们放弃使用碳信用额的同一个月内,国会提交了长达一份 648 页的议案,这项议案要求每家美国公司都要实行碳信用额计划。但在这份长长的议案中,两个简单的问题没有回答:谁来缴税?这项税收被一位政客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意义的创造财政收入方案”,那么上缴的税收又该如何花费?这份议案中还包括新的能效标准的内容,比如要求安装“玻纤沥青瓦”材质的“倾斜式屋顶”,另有 10 页讨论“便携式灯具”,包括“艺术品灯具”和浴缸所需的备用电源。

政客们的傲慢、自大和虚伪没有止境。他们要把他们不能忍受的法律强加到我们身上。这又回到“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学我做的”的心态上。这在把我们带向专制的道路上去。

关于电灯泡的谎言

警告:加利福尼亚州认为该产品包含一种致癌的化学物质。

警告:加利福尼亚州认为该产品包含一种会造成生育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学物质。

听起来像是恶心、危险的东西,不是吗?的确如此。这种产品是汞,有毒性,所以加利福尼亚州要把这两条警示语印制在金枪鱼罐头瓶上。

如果汞有毒,为什么国会要求我们从 2012 年起在家中、办公室、医院和教堂使用汞灯泡呢?

每支荧光灯管(CFL)平均包含 4 毫克汞,比一罐淡金枪鱼包含的 0.12 毫克汞要高出很多。

更糟糕的是,自私的政客们为保护环境而下令使用的电灯泡毒性很大,所以环境保护局介绍了荧光灯管打碎时的清洁步骤。以下是其中一些要点:

- 清洁之前:使房间空气流通
 - 让人们和宠物离开房间,走出房间时,要绕开灯管被打碎的区域。
 - 打开窗户,离开房间 15 分钟或更长时间。
 - 如果有的话,要关闭中央通风加热或者空调系统。
- 地毯或毛毯清洁步骤
 - 小心捡起玻璃碎片,把碎片放进一个装有金属盖的玻璃罐子里(比如一个罐头瓶)或者放进一个封口的塑料袋中。
 - 使用粘胶布,比如胶带粘起残留的小玻璃碎片和粉末。
 - 如果需要真空吸尘,将所有可看得见的物质清除后,用真空吸尘器吸尘。
 - 移走真空袋(倒空或擦净罐子),将真空袋或真空碎片放进封好的塑料袋中。
- 衣物、床上用品和其他软材料的清洁步骤

- 如果衣物和床上用品与碎玻璃或者粘附汞的粉末有直接接触的话,应该把衣物和床上用品扔掉。不要清洗弄脏的衣物或床上用品,因为粘附在衣物中的残留汞可能污染洗衣机或者下水管道。
- 处理清洁后材料
 - 立即将所有清洁材料放在室外的垃圾桶或者被保护区内,以便垃圾下一次被正常运走。
 - 和当地政府或州政府确认你所在区域对于该材料的处理要求。有一些州不允许这样处理垃圾。他们要求含汞的灯泡不论是否破碎都应带到当地的垃圾处理中心。

一个女人不幸打碎了家里的荧光灯,被州政府环境保护局告知溢出的汞高出该州“安全标准”的6倍,所以要考虑花费7000美元请处理危险材料的专业人员来进行清洁。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换一支荧光灯管需要多少家机构来运作: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和当地危险品处理机构。

如果你把脑袋埋在沙子里不闻不问,相信事情自己就会变好,但你有一天醒过来时,发现政府决定不管你了,你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被套上政府奴役的枷锁。

每一项“感觉良好”的环境政策都是有代价的。政客们和极端环境保护主义者从来不讨论碳信用额,荧光灯管或关于气候政策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成本,但不讨论它并不意味着成本就不存在。

比如,托马斯·索威尔教授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谈到,实行“理性增长”和“开放空间”环境政策的城镇,其房价远远高得多,为什么? 供需关系。对可开发土地进行“人为限制”导致建筑土地的成本上涨。这是另一个说明感觉和思考是有差异的例子。没错,开放空间让人感觉很好,但一旦你认真思考,你就意识到隐形成本很大。

作为一个议题,气候变化问题具有改造美国的所有元素。有年轻一代的巨大支持;这么好的议题,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会感觉有愧;和全球最重要最有影响力企业

和企业领袖的联系;和世界能源供应的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牵涉到上万亿美元的资金。

当迈克尔·摩尔称奥巴马“得到巨大数量美国人的支持”,已被授予“我们的许可,去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时,迈克尔这番话又代表了多少人的立场呢?这不是我们共和国运作的方式——一个“做自己认为合适事情”的人不是总统,他是独裁者。我们不能让世界上的迈克尔·摩尔替我们说话。

这不奇怪吗?法律并不要求你救助一个受伤或受死亡威胁的人?如果你看见一个陌生人或者你的亲人在游泳池中溺水,法律并不把救助他们的义务强加于你,即使你可以毫无风险地这么做。但同样一部法律却以惩罚来威胁你,要求你循环利用旧车,避免让车闲置,还要把有毒汞的荧光灯放在自己家中——说这一切都为了保护环境。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部法律的优先权错置,那这种法律就不能长久。

已成文的法律、规章和制度数量繁多,漫无边际(自从1995年以来已新增51,000条新法律),还有即将

建立的一些法规(比如“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这些法规不是要改变你的坏习惯,而是要摧毁你的精神。他们想要告诉你的是你已不再重要,你的地位与斑点猫头鹰和田鼠差不多。

这些法律完全是在提醒你,你作为个体甚至一个人的重要性取决于你被州的认可程度。我们被教育过,在一个范围更大的社会中,我们只是这个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的一小部分,其他还有树木、植物和动物……大家都是平等的。进步主义者必须让你忘记你的权利来自于上帝,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把我们变成进步主义者H. G. 威尔斯所称的“进步的纳粹”,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要寻求国家指导,区别只是这场纳粹运动没有暴力而已。

但也有好消息:那些利用环境话题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人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就像我早先说过的,人们一旦认为他们关于某一问题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就不会退出辩论。但这正是全球变暖加税问题的支持者所做的。当然,他们写书或者制作纪录片,但对于能改变国家,如果不是全世界的一个议题,我们的要求是否并不能仅限

于“专家们都同意了”？毕竟，专家们以前还有过关于美国不会遭遇经济危机的看法。

政府认为：你就是问题所在

枪支销售在上涨。仓库库存弹药不多了。为什么？因为人们不相信政府。而且这种感觉似乎是相互的——政府也不信任你，至少不信任拥有一支枪的你。

并不是政府反对枪支；它并不反对。政府购买的、用来武装军队的枪支数量比美国任何一个集团都要多，30 个联邦机构和 85,000 多名政府雇员或政府承包商都携带武器。比较一下的话，加拿大现役军人携带武器的人员数量都要少于我们联邦政府的民事机构！

所以，政府不是反对枪支，但他们一次次的立法，费力地提出许多新的要求表明，他们好像反对的是你拥有枪。

华盛顿有漏洞的逻辑显然是，如果你出于保护联邦国家财产或者给政府雇员提供安全的目的，政府确保你

能拥有一支枪。但同样是一支枪,如果你拥有它是为了保护你的家和家人,我们的政府就把你当普通罪犯一样对待了。

我敦促你要记住,政府的权力仅限于我们让渡给它的权力,政府不能拥有我们公民没有的权力。如果政府声称它使用武器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国民,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也必须拥有同样的权利。上帝赋予我们权利,我们把它借给政府。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说服我们,说我们的权利来自于政府。

我们被赋予了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赋予了这些权利,我们必须有保护这些权利的方式。帕特里克·亨利做了以下总结:

我们最后退化到如此尴尬和自我贬低的地步了吗,那就是我们不被信任用武器自卫? 自己拥有保管武器,与把武器交给国会管理,两者有什么区别? 如果拥有武器的真正目的是保护我们,那么谁来监管武器会比由我们自己管理更值得信任、更合适或有同等安全性呢。

华盛顿和学术界有很多人想让你失去自卫能

力——他们想要强迫你依赖于政府寻求保护。他们认为我们对待持枪暴力活动最好的防御就是幻想“枪手最后没子弹了。”那些有自己的私人保镖、孩子在私立学校就读,以及居住在有门卫看守社区里的人也持这种观点。

我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权利将继续遭到持续的但却是间接的攻击。毕竟,政客们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攻击这一法案。乔治·梅森早先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大不列颠做出奴役美国的决定后,英国议会得到一个狡猾的人的建议,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总督,他建议解除人民武装,认为这是奴役他们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要削弱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慢慢地虚弱……

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思考一下政客们已经做的或正在做的事情吧,他们使得我们对枪支的获取、拥有或了解变得越来越难。

- 在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让你登记手枪颜色时,要求为深绿褐色、黑土色或者黑色,但不能是阴阳

黑色,因为这种颜色在“安全手枪登记册”中没有列出。

- 芝加哥则要求你每年都对枪支进行登记,如果你不遵行,枪支便被认为是“未注册”,这意味着枪支不能在城市区域内保留。

- 在纽约,获得枪支许可需要花上 1 年的时间,花费约在 500 美元以上。要填写的文件如山一般高,内容包括个人特征和驾驶记录,而且申请人必须和一名警察进行单独面谈。

会有人天真地坚持认为,为了维护更大层面的利益,这些琐碎的步骤是必需的。我们的政府尽管不够完美,但不会故意伤害或者监禁无辜公民的。这些人承认,在德国,发生过枪支被没收后公民遭到伤害或拘押的事件,但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美国。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请提醒他们以下三件事:

1. 提醒他们美国总统第 9066 条行政命令的受害者,该法令将 15 万日裔美国人赶出住房,关进收容所中。这项命令由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按照进步主义者的论点,尽管宪法规定美国人有诉讼和私有财产

的权利,但国家“更大的利益”要求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监禁。许多日裔美国人再也没能把他们的房子或财产要回来。

这些日裔美国人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相信法制,相信宪法保证他们的权利。现在我们认为这些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历史上的这块污点却证明了,只要国家觉得合适,他们就可以中止我们享有这些基本权利。

进步主义思想如今表现在两个领域:(国家对私人产业之)征用权和个人隐私权。

征用权

……如果没有公正的赔偿,私有财产不得被征做公用。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以进步主义的观点来看,征用权是国家为了“更大的利益”征用私有财产的权力。历史上,政府征用个人房屋或土地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要这么做,他们必须用于公共用途——比如建造一条高速公路。

“用途”(use)这个词非常重要,特意被詹姆斯·麦

迪逊放入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该法案还包括政府对于征用的任何私有财产,都应给予赔偿。为什么用了这个词“用途”?这是一个折中方案。

我们的宪法是根据建国先驱们与独裁的英国政府抗争的经验而编写的,当时的英国政府随意地把私有财产攫为己有。

麦迪逊希望这个词能阻止美国政府落入同样的陷阱,但他也要做出让步,因为还有一些建国者认为“公共目的”这个词更合适一些——这个词将给予政府更多的权力。

现在回顾起来,关于目的还是用途的争论似乎关系不大,因为高等法院现在也参与进来了。在克罗诉新伦敦城案(*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中,虽然没牵扯到有直接的公共用途,可法院还是批准了私有财产可被征用。克罗案意味着允许市政府攫取私有财产,并把它出售给开发商,仅仅是增加市政税收、为公共利益服务。

但是“利益”不等同于“用途”。很多事情都可能有利于更广大层面的利益(比如征用城镇一部分最难看

的房子,拆除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但在该案中并不是为了公共用途,所以是违反宪法的——或者至少在以前是违法的。

私有财产是保护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基本条件,因为私有财产能使个人通过聚集土地积攒金钱和财富,从国家那儿获得独立。

在独立宣言中,建国者们本来要宣称的是美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保护,后来在劝说下写入的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追求”的权利。

为什么?因为南部各州将奴隶视作私有财产,他们不希望南部各州以私有财产受到保护为由继续实行奴隶制。

有反对者完全不相信政府的作用,从他的话中很容易看出私有财产对于保护自由的重要性。

约翰·亚当斯:“财产没有上帝的法律那么神圣,所以得不到法律和公共司法的力量的保护。一旦把这种思想传播给社会大众,无政府主义和专制统治就会出现。”

隐私权

因为政府的奇思怪想,不仅我们的家不再有保障,我们的身体也可能不安全。几乎所有的州都要求强制性的血液筛查检验,条款中关于不参加检验的规定很少。专家们告诉我们,该检验的医疗意义很重大,比如保护儿童。但漏洞开始出现了,因为州政府被授权对新生儿的血液和 DNA 也进行保存、检验和研究。

我知道我要说的听上去有点像阴谋论,但我并不想为我不信任政府的谨慎和判断力而道歉。即使他们的意图现在是好的,谁能保证他们在 10 年、20 年或者 100 年以后是什么样子? 如果国家在不征得父母同意的前提下对新生儿提取血液样本,那么国家的权力还能有什么限制?

就像见义勇为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一样,但却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我相信社会倒退的另外一个信号就是,被控谋杀和强奸的人,其血样和 DNA 得到的保护比无辜新生儿得到的保护更多。

2. 提醒他们,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贯穿富兰克

林·罗斯福的任期内,有成千上万的政治、劳工和反战人士因为开口反对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而遭到逮捕。进步主义者又一次无视宪法赋予的自由言论和集会权,他们的论点是通过逮捕这些人来最好地服务于“更大的利益”和“政府国家安全”。

今天仍有同样的思想——但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国土安全局最近发布了一篇题为《右翼极端主义:当前政治和经济形势加速右翼激进和重整旗鼓的势头》的报告,这篇报告认为,那些热衷于生命尊严、拥护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关于携带武器部分的人,或者那些武装部队的退役老兵们,他们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加大,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是的,没人想要把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召集起来,“政府的国家安全”这种论调将死灰复燃,你认为这距离我们还远吗?

我们领导人争取的权利和真正重要的民众权利之间的差别有让人唏嘘的讽刺意味。政客们强烈反对政府窃听越洋电话,即使电话中至少有一方被怀疑有恐怖主义嫌疑,请记住所有持反对意见的政客吧,他们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如此过分地侵犯人的权利!但当国土安

全局说要对上百万的美国民众进行监督时,尽管这些遵纪守法的美国人除了行使宪法权利之外什么也没干,这时候这些虚伪的政客们却什么也不说了。他们真的是一群丝毫不关心自由自主的蟑螂!

3. 提醒他们的还有,在“卡特里娜”台风来袭时,新奥尔良市的守法市民们需要保护他们的家人和财产,但他们的枪却在此时被市长和警察局长非法没收了。这是现代进步主义在现实中的例子。美国人合法购买并拥有枪支,政客们却视宪法和法规于不顾,以“更大的利益”和“公共安全”为由收走枪支。而且更具侮辱性的是,新奥尔良市才不会费力寻找他们没收枪支的合法主人;如果他们偷走了你的枪,你实际上还得自己申请要回来!

我们选举的领导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宣誓要维护宪法,反抗一切国内外的敌人。如今,公民们遵纪守法,枪支却被非法没收,此时我们的领导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通过了一部法律,规定从守法公民手中收枪的行为为非法。宪法第二修正案不是已经给这项权利以保护了吗?如果宪法都不能阻止进步主义者,那么批准另外

一部法规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他们只能这么做。几十年来，那些政客们不断地对担心政府阴谋论的人士进行惩罚，但现在却被自己的谎言套住了。所以他们做了政客们所能做的——掩盖真相。对于那些目睹了宪法被践踏的人，政府需要减轻他们的恐惧和愤怒，所以才再次立法，说，“看，即使我们想收枪也办不到了，法律不允许！”

不幸的是，法律对进步主义者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他们有更高层次的道德权威。他们总认为“专家们懂得最多”，在这种信念下，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被合理化了。他们对于“更大利益”的认识总能打败你的个人权利。事情总是这样的。进步主义者在第二修正案中看到的不是个人携带武器的权利，看到的是集体权利，集体权利受国民自卫队领导，由政府组织。虽然他们很少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对个人拥有枪支的不断阻挠显示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几十年来，进步主义者一直试图对个人获得、占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加以限制，但美国人民成功地挫败了

他们的大多数次企图。幸运的是,舆论似乎也开始反对他们。2008 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自武器持有问题在 51 年前提出来,禁止持有收枪的民众支持率目前处于最低点。

但进步主义者是有耐心的人。他们有条不紊地推进自己的议程,从不错过他们可能得手的地方。关于携带武器权利的议题就是这种耐心的最好体现。既然进步主义者不能直接地限制枪支,他们必须采取迂回战术。1997 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美洲国家间禁止非法生产、走私火器、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公约”的多边协议。也许你从未听说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监察和平衡制度发挥了作用:参议院没有批准这项公约。

但现在,在墨西哥毒品暴力犯罪的背景下,奥巴马总统重新提起这项法案、敦促参议院批准。像奥巴马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没有让法律或现实拖他们要“做善事”的后腿,所以在最近一次对墨西哥的访问中,奥巴马总统宣布,“这场战争所使用的枪不是在这儿而是在美国购买的。在墨西哥发现的 90% 以上的枪

来自于美国……”

这个数据引人注目：90% 走私的枪支来自于美国。快点吧——我们赶紧采取行动！

但有一个问题……这个数字是错误的。事实是，90% 的枪是指墨西哥退还给美国的枪大部分来自美国，但没人知道没有退还的枪是多少，或者墨西哥决定退还的是哪些枪。这两个重要因素歪曲了这个数据。有一些独立调查的数据表明，在墨西哥罪案现场发现的17%—36% 的枪来源于美国。

很不幸，对于那些想要推进某项议程的人来说——比如推进一项国际轻武器公约的签署——36% 的数据就不如 90% 的数据更引人注目，所以就被忽略了。

随着奥巴马总统和其他进步主义政客们的上台，枪支和弹药的销售也上涨了。这能自圆其说吗？我不知道，但鉴于之前我们的权利受限制的教训，我们不能怪别人太谨慎。毕竟政界和媒体的大部分“专家们”不能理解的是，枪被买了并不意味着就要使用它。不管你是否相信，行使权利和犯法是两不相干的。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新的美国名词“信任指数”。当枪支和子弹的销量下滑时,这意味着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反之,当销量上涨时,则意味着人民对于政府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的信任度下降了,这就是常识,不是吗?

敌人就在内部:小心行事

报纸和电视铺天盖地的报道都集中在经济危机上,但却忽略了正在发生的更深刻更为致命的情况:美国中产阶级的公民权日益被剥夺,在经济好的时候,美国人宽容了我们的政客们,尽管他们的渎职、撒谎和腐败削弱了我们的家庭和国家。但现在,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一直按规矩做事的人们已变得不耐烦。

如果领导人想要消除人民对他们越来越多的鄙视,就要重新建立起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如果你承诺在南部边境修建围墙,那就盖起来。如果你说你想要整风,使政府廉洁化,那就不要给偷税者许以要职。如果你承诺要使美国能源独立,那就不要回避谈论沿海采油或者

利用核能源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挽救经济,那就不要大把大把地花几十亿美元的钱,操控私营企业、诋毁企业高管,还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

常识告诉我们,如果 66% 的人对政府“合理化”管理“财政”的能力完全不信任,或者不太信任政府的能力,那就说明公众对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逻辑告诉我们,当只有 22% 的公民相信政府大部分时候做得是对的,政府就必须做出政策的调整了。

但进步主义者不会“让步”,因为他们和他们手下那些有用的傻瓜一样,与你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属于拉斯穆森报告中定义的占人口 7% 的“政治阶层”:

- 相信政治领袖、而不是美国公众的判断力;
- 驳斥关于政府是关注自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观念;
- 认为大企业和大政府的合作是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以上是该阶层的观点。51% 的美国人对遍布美国的“茶党”有“好”的印象,32% 的人有“非常好”的印象,

81%将自己定义为“政治阶层”的人对此或印象“不好”或印象“非常不好”，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们和你的世界观不同，他们要确保你和你的孩子听从他们的意见。你感到他们在居高临下地和你说话，你这样感觉是因为他们确在居高临下地和你说话！他们不仅认为他们有解决问题的答案（更大的政府），而且他们的答案就是唯一的答案。

如果你感到政府和所谓的媒体精英们高高在上的话，那么你和沃尔特·李普曼就持有相同的观点了。作为一位记者和进步主义者，李普曼先生在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非常有影响。他认为媒体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政客和公众之间的调解人，公众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教育，很难真正理解发生的新闻。

根据记载，他曾经这样说过，大部分民众“头脑像小孩或者像野蛮人”，需要那些自封为专家的人帮助他们分析问题，做出决定。

当政客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者“这是一个关系微妙的法案”时，他们会把这部分跳过去不

谈,这是李普曼哲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政客们的世故,他们总说“你不会理解的”。

把普通美国民众视为对公众事务不感兴趣,或者不够聪明、理解能力差,政治阶层在剥夺公民的权利、滋生社会的不满。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恢复美国人的信心。我们需要一言九鼎的领导人。那些袒露自己真实想法的领导人,而不是只说些顺耳话的领导人。在竞选期间,如果一名候选人在电视播放的演讲片段中说些实实在在的话,听起来虽不那么中听,但对于一直渴望坦诚的上百万选民来说,就很难得了。我们会支持你。

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不为自己的政策道歉。因为这一点,我非常敬重他。我宁愿希望一个国家有很多诚实的经纪人,尽管我可能憎恶其政策,也不希望一个国家充斥着会说漂亮话、做的却是另一套的人。只有把原则坦诚地表达出来,才能对一些问题展开真正的辩论,才有机会取得真正的进步。

不仅仅是政客会欺骗,还有一些人试图利用你的挫

折感和绝望情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他们会宣扬政府在搞独裁;怂恿你参加黑社会和采取暴力革命。我告诫你离他们远一点儿。

没有专横暴虐的组织需要被摧毁,也不存在全球阴谋论。传播这些谎言的人有他们的计划,但是,和所有极端主义者和革命者一样,他们最终要将他们的规则和生活方式强加在我们所有人头上。

不犯错误,我们需要一场革命重建美国,这场革命可以使用民主作为战斗工具,这不是号召使用武器或暴力,而是呼吁我们回到我们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宣誓效忠美国的人中间充斥着许多叛国贼。作为“战争中的首要牺牲品”,真相很稀缺,让真相成为你导航的北斗星吧。

客观原因和内在常识告诉我们,对政府的忠诚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出于自发的对政府出色工作的尊重,第二种是非自愿的,是迫于外部力量威胁或出于完全的恐惧。有关数据明显表明,我们的政府正迅速地向后者转变,这种转变必将失败。

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样,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学校灌输的对政府和领导人的信任和尊敬。在学校,我们了解到乔治·华盛顿的无私、亚伯拉罕·林肯的诚实,和美国人为了将十三块殖民地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所做的牺牲。我们知道了美国人民是如何团结起来打败纳粹和法西斯,并把人类送上月球。这些历史事件,加上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令人自豪的作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现在教育体制因受资助而沦为政府和进步主义者的猎物,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下一代。历史、阅读、写作和数学这些课程居于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教条,包括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大政府的益处等内容。尽管我们千方百计地在家中给孩子打“预防针”,防止孩子们受教条毒害,但教育就像麻醉针使孩子们变得迟钝失去对课程和思想的防范。

教育对于改造美国未来起着重要作用,因而教育成为进步主义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不让人奇怪了。20世纪初,进步主义者加强了教育的义务性,使得中小学入学率与公立学校支出一起上升。对于进步主义者来

说,让更多的孩子走进课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孩子们受教育的内容施以影响了。

，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伍德罗·威尔逊坦率地解释说,“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生活……(而且)要尽可能地使他们不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

进步主义者不希望教育是从老师到学生,他们希望学习是建立在孩子们自己的经历和感觉上。他们要建立一种教学结构,在课堂上,相对于老师而言,孩子们是“平等参与者”的身份。但这种构想没起作用。看以下数据:

- 2004 年,巴尔的摩市公立学校中仅有 34.6% 的孩子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 印第安纳波利斯公立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仅为 30.5% ;
- 底特律公立学校尽力使 25% 的学生有资格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 纽约市公立学校 45.2% 的学生高中毕业。

以上数据发人深思,进步主义者仍不把家长当作孩子学习中的一环,他们将家长视作障碍。他们认为父母对考试分数和成绩单的看法呆板,无法使孩子意识到自己的全部潜力、价值和在更广大社会中的作用。历史上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子。

18 世纪初,法国革命家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提出由国家教育培养下一代。20 世纪初,希特勒告诉他的拥护者们说,那些反对第三帝国和其意识形态的人终将失败,因为用他的话说“你们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孩子长大后只知道他被抚养长大的“新营地”。

最近,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现代进步主义者”)宣布,需要“一个村子的人”来养育一个孩子,暗示社会有义务决定孩子受教育的内容以及孩子如何被抚养长大。克林顿和其他进步主义者真的认为“不能说孩子是属于某个人的了。”(译者注:言下之意孩子属于社会)

因为进步主义者的很多思想都感觉不错,向教育和社会学专家推销就不是件难事。他们引入“课堂社会”

的概念,敦促老师做孩子们的“朋友”。多年来孩子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认为,他们每个人在教室里都是平等的,感觉比考分更重要。当这些孩子步入社会成为劳动阶层后,我们发现这种思想开始影响美国的经济生活。如果竞争和勤奋在学校里不重要的话,那在工作中也就不重要了。

尽管这种教育政策降低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步主义者仍然不满足,还在向前推进。他们把教育责任从社会转向州乃至联邦政府,现在他们则想推向全球层面。

联合国关于儿童权利的公约已被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批准,除了美国和索马里之外。该公约要求国家给予儿童一定的“权利”,包括:受教育和医疗的权利;发展儿童个性和才能的计划、在和平、有尊严、宽容、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氛围中成长的机会。

就像公约所说的,“通过同意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批准或者加入公约),政府承诺将致力于保护和保证儿童的权利,并同意在国际社会中对这份承诺负责。”

与“国际社会”相呼应一直是进步主义者积极主张的,所以国会有人再次呼吁美国应该批准该公约。与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情形一样,进步主义者告诉我们,美国因循守旧,和世界其他“进步”国家已经脱节。

事实上,进步主义者关于“照管孩子”的行为都是借口,企图隔断父母和孩子间的关系,将教育权转移到政府或国际层面。进步主义者意识到家庭是社会最基础最根本的柱石,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他们可以在孩子们心中建立起政府的权力和孩子们对国家的“感情”。

这种例子总是随处可见。当你的孩子使用学校发的避孕套、咨询医务室护士或计划堕胎时,孩子们没必要告诉你。政府很高兴地插足进来做父母的代理人,当需要做出关系到孩子们人生的转变,或者感情上难以抉择的决定时,家长被抛在了一边。

对于那些继续战斗反抗的人,政府在盯着你们。常识甚至事实是否在你这一边并不重要,如果和进步主义的发展相冲突,你将成为被攻击的靶子。看一下华盛顿

特区的教育券计划吧。政治精英和他们的联盟伙伴们并不在意这样一些事实,那就是参与这项计划的孩子所取得的考试分数要比公立学校的同学高出很多;或者有8000名急着从公立学校退学的学生申请了1714份奖学金,或者7500美元的教育券成本只相当于该地区支付同一名孩子上公立学校学费的一半。这些都不重要,因为特许学校在政府和教育之间设了一堵墙,这面墙撑不住了……华盛顿特区的教育券计划也是如此。

尽管有个似乎可以覆盖所有项目的庞大预算,奥巴马政府还是终止了该计划,拒绝再接纳新生。可以预见这项计划将慢慢地无声息地被扼杀。在教育“专家们”的眼中,孩子们在破败、悲惨和不稳定的公立学校里上学更好,因为公立学校有政府监管,总比缺少政府管制的其他学校要好。这就体现出我们领导人的权力和傲慢。

家庭教育是进步主义者矛头所指的另外一个领域,因为政府无法在家庭餐桌边安插座位了。他们将那些对孩子实行家教的人贴上“落后”、“社交不发达”,或者宗教狂热分子的标签,这些攻击言论只是掩饰而已,他

们真正担心的是政府对家教无从控制了。

你可能会嘲笑并认为,政府反对家教如同反对武器持有权一样,结果都不会成功,但你错了。就在几年前,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认为,根据加利福尼亚的法律,“父母不享有对子女进行家教的宪法权利”。他们判断的基础是“教育体制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龄儿童良好的公民素质、爱国主义、对政府及国家的忠诚,从而保护公众利益。”很显然,法院认为家庭教育不能保证孩子受到爱国主义和对政府“忠诚”的教育。

许多人会说法院这项判定后来被撤销了,家庭教育在今天的加利福尼亚仍然盛行。也许这是真的,但我要提醒你,进步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很有耐心。他们在等待时机,将选择大众舆论和司法需求结合的最佳时机,再次出击掌控局势。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会把战场转移到国际上,为你的孩子进行他们认为最好的教育规划,通过诸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协议达到目的。

进步主义者不在乎小小的挫折。他们会继续战斗,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我们。他们的确没有理由害怕我们。

尽管他们不懈地公开地要改造美国,但一次又一次我们都没能阻止他们。

常识告诉你,如果政府愿意动用权力和力量阻止另外 1700 名穷孩子获得华盛顿特区的教育券,他们将会更加拼命地将 100 万名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这样,关于“忠诚于政府及国家以保护大众利益”的内容就可以被适当地搬上讲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相信了政客和官僚们的说法,说金钱是解决教育体制问题的答案。事实不是这样,正确的答案是我们应站起来反对引导我们走向毁灭的进步主义政策。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钱,我们只需要更多关心学生的老师,更多愿意做正确事情的政治人物,更愿意回归传统“家长—老师”关系的父母,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少一些职业政客阻碍常识的改革进程。

我们需要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民

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观点不仅限于教育。我们都开始相信这种说法了。如果我们没有钱,我们之前什

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我们认为自己值得拥有所有一切——包括大房子、豪车和大电视。家庭人口少了,但我们的住房面积大了。中等面积的房子从 1950 年的 983 平方英尺扩展到今天的 2512 平方英尺。大一些的房子自然价格就高一些。过去的 58 年间,中等面积房的房价从 65,087 美元(通货膨胀调整)涨到 165,400 美元。

对比一下让人觉得悲哀,我们的房子大得似乎能容下一切,却唯独没有上帝。新技术使我们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但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却更少了。互联网使地球变小,但我们和社会的距离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热切地排队,想得到更多!

网球名将阿瑟·阿什描述了 1992 年发生在洛杉矶的暴乱,“我感到恶心,”他说,“那不像我们……我们曾经是一个有尊严和道德感的民族;我们希望世界公平对待我们,我们也尝试着大体上公平地对待世界。现在我看到的一个新秩序完全建立在复仇上,公正丧失,道德

沦丧。人们不去选择正确的、公正的或道德的,却只想
去报复。”

现在许多人经历挫折后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金
钱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方
法。好家庭需要好父母,好社会需要好邻居,而好政府
则需要好公民。

一直以来,我们国家的传统就是为家庭、社会和国
家付出无私的牺牲,在今天这场变革中则意味着我们要
成为一名志愿者。

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义工团自称是献身于
服务的自愿者组织。但该组织成员每月却领取津贴,加
起来一年有几千美元的收入。还有用来支付大学学费
的奖金,一年也有几千美元。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你做
某项工作获得金钱报酬,那你其实是一名雇员或一个承
包商,而不是志愿者。

自愿组织这种微妙的转变看起来没什么害处,但却
反映了进步主义者的思想,认为更重要的是招募青年人
加入美国义工团,这比让他们体验真正的志愿者服务所

带来的无私奉献精神更重要。原因是进步主义者试图重新定义服务、自愿服务和慈善,从而将世俗和精神进一步结合起来。他们想要把政府批准的工作和政府批准的自愿服务工作之间的障碍消除。对于他们来说,这二者是一样的。

在当下这个善良、美德和谦逊稀缺的年代,宗教越来越被视作是一个障碍,而不是被看作是救世主。这个谎言应该被驳斥,不是通过辩论,而是通过举证。就像宗教的缺乏不是大屠杀的原因一样,宗教同样不是不容异说的原因。人们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以宗教名义杀戮的人,和希特勒一样有妄想症,屠杀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的利益。

所以,为什么宗教对于民主正常的发挥作用如此重要呢?我们的建国先辈们再次给出了答案。在写给耶鲁大学校长的一封信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写道:

这是我的信仰:我相信上帝,他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通过他全能的力量统治我们。他应受我们的礼拜。
我们能提供给他的、可接受的服务就是对他的其他子民做善事。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根据他在这个世界的

作为,在另外一个世界将对其灵魂进行审判。我认为这是所有合理宗教的基本点。

这不是关于某一特定的教义、教条或教堂,而是关于所有宗教的,只要这种宗教是激励人们追求无私、美德和神圣的宗教。建国先辈们所熟知、而正在被我们遗忘的东西:团结我们的因素比分裂我们的因素更多。美德、诚实和品行并不为某一宗教信徒所独有;而是可以在任何一个以神为根基的宗教场所里发现。我们忘记了这个教训,没有把宗教当作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却用它来羞辱或指责别人。在很多人看来,定期到教堂做礼拜不是社会的支柱,而是怪人或极端主义者。

通过树立对彼此宽容和无比包容的榜样,可以改变上述思维模式。我们不要再利用宗教符号在政治上得分。难道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不自信吗?以致我们不能张开双臂去接纳不同的宗教和祈祷方式?就像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的:

大胆质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倘若上帝真实存在的话,他必定更加赞同理性而非盲目恐惧。不要因担心后果而害怕质疑,如果不相信上帝,你也会于道德

行为中感受到的快慰,发现道德之鞭策。

宗教和其追随的信徒们必须停止彼此敌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詹姆斯·麦迪逊所说的,“自由和爱国精神使人类的一切教派都充满了活力。”

但是进步主义者并不那样看。他们希望我们自相残杀,因为一个分裂的群体就无法与他们对抗。他们意识到宗教有团结的力量,是对抗国家机器的制衡力量,所以他们认为,宗教或者被国家操控或者被消灭。因为美国人民忠诚的对象不能有对手。

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话题一样,进步主义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现状。他们了解宗教强有力的作用,所以他们不能跳出来一下子否定。相反,他们寻求与宗教合作,阐释宗教教义,就像伍德罗·威尔逊所做过的,他曾经宣布,“没有比人类服务更高尚的宗教了。为大众服务就是最伟大的教义。”他的前任,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也宣称,当人民投票选举谁将成为他们的总统时,选举过程应“被看作是接近于上帝的旨意”。

用“普遍利益”替换掉“上帝”作为最高等的宗教形式,他们其实在说你的权利、自由和自主都来自于政府,而不是建国先辈们教导的,我们的权利来自于上帝,并且我们把其中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政府。

法国进步主义者让·雅克·卢梭认为,为了社会,宗教和政治对社会的目标与抱负应该协调一致。对于其中一方的忠诚应该自动转换为对另一方的忠诚。

不仅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还有一种虔诚的想法认为政府的工作就是促进上帝的工作。“社会福音”的概念绝不仅限于历史。在今年的全国祷告日早餐会上,奥巴马总统表示,当年他在芝加哥街道上组织当地社团工作时,这份工作使他产生了皈依宗教的念头。这本身没什么错,但却表明对于奥巴马来说,组织社团并不仅仅是政治行为,还是一种精神行为。所以当奥巴马呼吁美国人“以尊严和敬重来对待那些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与之共享片刻的人们”,他称之为“黄金定律”。很显然,利用政府的杠杆和权力使事情发生被他当作了自己的义务。

从我们领导人如何看待慈善捐赠中也可以找到这种信仰的影子。尽管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的个人薪水已达到6位数,但他在过去的10年间每年平均只捐出369美元给慈善机构。在考虑竞选总统之前,巴拉克·奥巴马将薪水的1%捐给慈善机构。我不是告诉别人该如何花钱,但想到进步主义的首要任务以及奥巴马总统看待美国志愿者的方式,让我怀疑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的吝啬。这可能反映出他们的信念,就是慈善捐赠的多少不如提倡慈善行动,而他们可以通过推进“更广泛的利益”来实现慈善行动。

我们一定不能走入这个误区,不能像政客一样虚伪。我们不能一方面鼓吹忍耐,另一方面却背道而驰。富兰克林曾经指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民才配得上拥有自由。”这是因为民主需要自律,而自律这种美德是那些贪婪和仇恨的人不具备的。对自由的追求太伟大了,不能毁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手中。请记住,对于我们来说,奴隶和独裁这样的概念已经被历史唾弃,但人人都必须自由的概念也同时在历史中被遗忘。

第六章

是朝阳还是落日？

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带上你的激情，把火枪留在家中。这次革命将在我们的心智中展开，不是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是要解放自己的专制思想。

当权者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瞻顾过去以预见未来，作为立国之本的原则已经过时了，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样的选择对于我们是最好的。所以只有当足够多的美国人反驳他们上述谎言时，革命才能赢得胜利。

反抗实际上就是抛弃你目前所属的任何政党，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你的态度是认真的。不要再向无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或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给予资助，把你

的时间和精力给那些为你的价值观而战斗的人,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捐献资金的方式。

当这一切要发生的时候,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政党将会恐慌。因为独立思想者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当权派会对你感到畏惧。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互相厮杀,受过教育的公民们已经看透了他们的谎言和腐败,恐惧和发怒是他们剩下的唯一防御武器。

从前让奴隶受教育读书是非法的。因为当时的奴隶主们就明白我们两党体制现在所知道的:那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会摆脱束缚的锁链要求自治。

华盛顿的当权者们认为绵羊很多,但没有牧羊人。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听见我们斩钉截铁的声音:我们不是绵羊,美国人从来都不是绵羊。我们是牧羊人,如果我们不做回羊群的领头人,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个位置。

有一些人呼吁开展暴力革命。他们错了。我们的未来不是一条血腥之路。暴力这个幽灵一旦被释放将无法控制,而且我保证,如果我们让其他人带我们走那

条被许多人走过的路,我们作为个人,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会更糟糕。

比武器和暴力更难击败的是真理。当权派能够用枪炮摧毁我们的肉体,但他们却不能够战胜我们的激情和思想,他们打不赢这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植根于我们建国理念的战争。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不要犯错,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这是呼吁大家行动起来。让我们站在一起挽着手臂。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的国家将被重新定义;是我们就国家的未来发表意见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划清底线,响亮地喊出我们的声音。

不要践踏我。

这不是一项小任务,不是脆弱的心所能承受的。生命不会丧失,但会身败名裂。还好成功的代价很小,因为历史已经表明,如果我们这次让自由从我们手中溜走,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自由。如果美国的尝试失败了,那么不仅仅在美国,全世界的自由事业也将归于失败。

有一天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子孙时,他们会问比自由更重要、更珍贵的是什么。他们会问我们,大而贵的房子、“免费”医疗和“现在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否值得让他们受奴役的代价来交换。

你会怎么回答?

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常怀着自豪和敬畏的心情、回顾我们的先辈们曾经为了保卫自由事业而做出的一切,同样,我们的子孙们也会回顾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现在失败了,他们对我们的感受将不再是骄傲和敬畏,而会感到厌恶。当他们在苛税和专制下辛苦工作时,他们会不断询问我们这一代人在忙些什么,竟然没有留意到我们的自由被掠夺走。当他们被国内外的主人套上奴役的枷锁时,他们会质问我们为什么什么也不做。他们会带着困惑质问,你们难道没有预见到这一切吗?

选择将由我们做出:我们现在继续自欺欺人,还是以后再把谎言告诉我们的孩子?

无论是华盛顿的政客或者联合国的官员,无论是

20 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其他组织都不能实现我们自由自主和向更好的方面改革的愿望,这些目标只能靠我们自己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反抗压迫的哨兵,就像我们的祖先们和前几十代人所做的那样。如果我们弃守岗位,让自由之光没入黑暗中,那么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影响不仅有临时性的,也有长远性的。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说过,我认为我了解你们,只是因为了解我自己。我们可能不会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我们都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对劲。

没人告诉我们在9月12日,即“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们要善待彼此,但这就是发生了。

我们知道我们最好的时光还没有结束。我们知道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年间解放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美国对自由的承诺使得孤独的企业家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发明有电灯泡、汽车、电话、电影、装配生产线、人工心脏、计算机、双光眼镜、缝纫机、冰箱、空调、安全销、电视机、收银机、蜡笔、电动工具、油井、水塔、冰棒、

蓝色牛仔裤、电梯、连发步枪、激光、小儿麻痹症疫苗、微波炉、复印机、光纤和棉花糖。

重新回到以前其实只需要思想的一个简单转变。就像我们在9月12日那天得到的一个发现，就是奇迹只需要思想上的一个转变。

当我们停止对自己说不能这样做或者我们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时，事情将开始改变。开始告诉自己“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做这些。”停止做奴隶，你将看见奇迹。

康复的第一步是承认你自己有问题。所以要讲出来，大声喊出来，“我们有问题。”承认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许是因为“我花钱花得太多”，“我没有留意支持率”，“我有党派偏见”，“我太胆小，或我太累了，不愿意参与”，“我反应迟钝，忘记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或者“我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和选择找到了借口”。

没有关系。过去的留在过去，要抓住未来。山顶上那座闪闪发光的城市依然矗立在那里。

不要犯错误，你必须采取的行动用语言描述很简单，但实施起来却很复杂。需要你付出时间、注意力和

决心。要有耐心,但也要有紧迫感——时钟滴滴答答在走,时间不等人。

攒起你的激情和力量,以和平的姿态向华盛顿进发。让你的声音被听见,你的愤怒表现出来。有人会把你说出的话贴上“煽动人心或者危险性的”的标签;要让他们理解,在那些不承认真理的人听来,真理总是愤怒的。

不要等待其他人把你的感受说出来或者做出来。如果好人现在赶来的话,美利坚合众国就不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中。放心吧,比你更胆小的人也会加入到战斗的队伍中来,他们在等待你的行动。

让我们手挽手,肩并肩,无所畏惧。去倾听、学习和领导。

1787年宪法签署后,本杰明·富兰克林谈话中提到一把属于华盛顿将军的座椅。在椅子上方镌刻的画映着太阳金灿灿的光辉。他告诉华盛顿将军,在建国的始终,他一直困惑着这是朝阳还是落日的光芒。

华盛顿问他,“富兰克林先生,那你现在认定是什么了吗?”富兰克林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朝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识: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美)贝克
(Beck, G.)著;徐红燕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1

书名原文: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The Case
Against an Out-Of-Control Government
ISBN 978-7-5118-0244-6

I. ①常… II. ①贝…②徐… III. ①经济政策—研
究—美国 IV. ①F1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6719号

常识: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	格伦·贝克 著 徐红燕 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新主艺设计室
--------------	------------------	-------------------------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77 千
版本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张宇东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0244-6 定价:19.8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 | |
|-----------|-------------|
| 《常识》 | [美]格伦·贝克 |
| 《我的穆斯林父亲》 | [英]阿蒂西·塔西尔 |
| 《无畏的希望》 | [美]巴拉克·奥巴马 |
| 《中国农民工调查》 | [英]魏 城 |
| 《文化智商》 | [美]布鲁克斯·彼德森 |
| 《别人的钱》 | [美]路易斯·布兰代斯 |
| 《永远的大亨》 | [英]乔治·爱尔兰 |
| 《商业无边界》 | 薛兆丰 |
| 《驴象庄园》 | [美]龚小夏 |
| 《帝国的命运》 | 韩满春 |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以及网络书店有售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www.lawpress.com.cn

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如果你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是原则应该高于党

派，人格高于竞选承诺，常识高于一切的时候了，

我请求你阅读手中的这本书……”

常识

GLENN BECK'S

COMMON SENSE

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

在过去的任何时代，美国人民都激发自己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他们对自己的自信有着无比的信心。他们知道世间凡事有因必有果。同时他们为国家的问题找到符合常识的解决方案。

有一位美国人，托马斯·潘恩，他是一位因写作《常识》而改变了美国历史的普通人。1776年，潘恩用《常识》这本名著，通过直接而无可驳斥的观点，鼓励他的公民同胞们去决定国家的未来，美国的自由。

几近两个半世纪之后，那些自由再次命悬一线。现在格伦·贝克重审潘恩强有力的论述，目的只有一个：激励美国人民看清最近两届政府舒适的政策，两党垄断的政治以及不合逻辑的行为，挽救一个伟大的国家。

上架建议：经济类

ISBN 978-7-5118-0244-6



9 787511 802446 >

定价：19.80元